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  
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影響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Depression**

指導教授：蘇昱璇 博士

研究生：洪怡華 撰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三月

## 謝辭

花了比預期更久的時間，終於完成論文，過程中遇到各式各樣的挑戰，也一一克服，謝謝當初決定到台北念研究所的自己，終於畢業了，希望日後也能繼續勇敢的面對挑戰。

能夠順利完成學業，由衷感謝身邊所有人的幫助。謝謝爸媽一直以來都給了我很大的自由，讓我想做的事，同時負擔了我的生活所需，支持我完成學業，也謝謝妹妹總是在我回家時，讓我充滿了電再回到台北繼續努力。

謝謝指導教授蘇昱璇老師，從碩一開始擔任蘇老師的助理，而後又在老師的指導下撰寫論文，謝謝蘇老師一直以來的細心指導與關心，在研究所的日子裡能遇到蘇老師，非常感謝。此外，也十分感謝兩位口試委員楊佩榮老師、莊雅婷老師用心地提供建議。謝謝在學期間所辦佩琦學姐與馬姐，協助處理各項繁雜的程序。

謝謝身邊的朋友們，生活各自忙碌，卻總不忘互相關心。謝謝慧儀，從大學到研究所一直像個姐姐照顧我、帶著我認識台北。謝謝心淳、煒淳在有點苦悶的研究所生活中，一起吃飯、聊天、抱怨然後再一起重新出發。謝謝卡拉，在我回高雄時找我出門吃飯、閒晃、打電動，身心靈都得到極大的放鬆。謝謝若若，雖然平時總是不正經，在我需要幫忙時總熱心的提供幫助。謝謝 SB 團員們，每半年一次的聚會，都能成為生活的養分。謝謝男友一直以來的照顧與幫助，生活雖然偶有摩擦，但謝謝有你的陪伴。

## 摘要

本文探討在青少年時期，不同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在國三與高三又會有什麼差異，並進一步探討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兩者間是否會強化或者削弱另一變項對青少年的影響。本文研究資料來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TYP)，使用其中國一樣本的第三波(2002年3月)、第四波(2002年10月)與第六波(2005年)的青少年問卷及第三波(2002年)與第六波(2005年)的家長問卷作為分析樣本，以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作為解釋變數，探討其與以下兩種被解釋變數——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憂鬱情緒之間的相關性，並以最小平方法及固定效果模型進行資料分析。

本文發現家庭背景在國三與高三都與青少年學業成績有正相關，親子關係只在國三時與學業成績呈現正相關，但對憂鬱情緒的改善則在兩個時期皆為正相關；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兩者間，並不存在統計上顯著之交互作用。除了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外，性別、家庭結構、學校所在地、青少年健康狀況皆與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及憂鬱情緒相關。

關鍵詞：家庭背景、親子關係、學業成績、憂鬱情緒、量化研究

##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depress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We also explore whether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ill strengthen or weaken the impact of the other variable on adolescents. The research data come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This thesis uses the third wave (March 2002), the fourth wave (October 2002) and the sixth wave (2005) of adolescent surveys and uses the third wave (2002) and sixth wave (2005) of parent survey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depression, we us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model and fixed-effects model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This thesis find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both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on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bu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exists in both time periods.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family structure, school location, and health status, are also related to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depression.

Keyword: family backgrou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outcomes, depressi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 目次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研究目的.....	6
第二章、文獻回顧.....	8
第一節、學業成績.....	8
第二節、憂鬱情緒.....	13
第三章、研究方法.....	19
第一節、研究資料.....	19
第二節、變數選取.....	20
第三節、敘述統計.....	24
第四節、估計模型.....	31
第四章、實證結果.....	33
第一節、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關聯.....	33
第二節、國三到高三之變化.....	47
第三節、固定效果迴歸分析結果.....	49
第五章、結論.....	53
第一節、研究結論.....	53
第二節、研究限制.....	56
參考文獻.....	57

## 表次

表 1 國三、高三敘述統計 .....	25
表 2 國三、高三敘述統計 .....	26
表 3 學業成績、憂鬱情緒敘述統計 .....	30
表 4-1-1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 .....	34
表 4-1-2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	34
表 4-2-1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 .....	36
表 4-2-2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	37
表 4-3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 .....	39
表 5-1-1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 .....	41
表 5-1-2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	41
表 5-2-1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 .....	43
表 5-2-2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	44
表 5-3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 .....	46
表 6 國三到高三學業成績、憂鬱情緒變化 .....	48
表 7 學業成績固定效果迴歸模型 .....	50
表 8 憂鬱情緒固定效果迴歸模型 .....	52

## 圖次

圖 1	親子關係相關變數次數分布圖 .....	29
圖 2	國三學業成績分布圖（標準化） .....	51
圖 3	高三學業成績分布圖（標準化） .....	51



# 第一章、緒論

##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是人力資本養成中重要的一環，對教育的重視，源自於教育成就的高低，時常會影響個人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人力資本的養成，更是關乎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隨著時代變化，教育擴張是舉世皆然的教育趨勢，當國家的發展進入一定程度，對高等教育的期待，便是由高等教育是屬於少數人特權的菁英型（elite type），慢慢走向於讓教育成為大多數國民權利的大眾型（mass type），乃至於最終的普及型（universal type）三個階段（Trow, 1973）。台灣自 1990 年代的一連串教育改革之後，高等教育發展進入擴張期，在政策的鼓勵及幫助之下，大學的設立漸趨容易，高等教育的進入條件也日漸降低（黃碧端，2007），在現今的台灣，大學為數眾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也逐年增加（教育部，2020）。

對於教育的投資，除了國家政策的影響之外，家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為了讓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資源，父母往往不惜投入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從過去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家庭背景因素與教育程度有莫大關聯，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為子女的學業表現帶來正面影響，然而，社經地位的差異，也讓家庭可以提供給子女的資源有所差別，較差的家庭背景條件，可能會限制了子女的學業發展與未來成就（Buchmann & Diprete, 2006 ; Haveman & Wolfe, 1995 ; Weiser & Riggio, 2010 ; Zax & Rees, 2002 ; 李佩嫻、黃毅志，2011 ; 李敦仁、余民寧，2005，林俊瑩、吳裕益，2007 ; 沈暉智、林明仁，2019 ; 黃芳玫、吳齊殷，2010）。

在華人社會中，始終瀰漫著一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氣，對許多父母而言，讓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取得高學歷，似乎就可以保證未來人生



的一帆風順，因而致力於提供子女更好的學習環境，但事實似乎並非全然如此，在全心關注教育成就提升的同時，父母與子女是否也因而忽略了身心的健全發展？隨著教育資源的普及，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件高不可攀的事，但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後，利用所學不務正業的情況卻層出不窮，不論是遙至 1998 年時轟動社會的清大王水案、21 世紀初時陳水扁貪汙案、乃至於 2020 年初盜版網站高學歷主謀遭逮，高知識份子情殺、貪汙、賄選、侵權等案件屢見不鮮，對教育的關注讓人著重於知識的追尋，卻也可能因為過度的關注，反而忽略了人格養成的重要性。

對學業表現的高度關注，可能因而讓心理健康的問題被忽視，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現今社會中，「憂鬱」對社會大眾而言，不再是個陌生的詞彙，而是日漸充斥於生活環境中，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一個有憂鬱情緒的人，可能會有對生活感到無趣、食慾不振、喪失活力等症狀，更嚴重者可能會產生死亡的念頭，因而，憂鬱情緒輕者影響個人的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嚴重者則會使人生活無法自理，導致生活混亂，進而造成家庭負擔或者藥物使用等社會問題，甚至因為心理健康問題，導致自殺行為的產生（陳思帆、張高賓，2013），根據衛福部 108 年自殺防治統計年報，自殺通報原因前三名分別為「情感／人際關係」、「精神健康／物質濫用」、「工作／經濟」，其中在「精神健康／物質濫用」分類中，又以憂鬱相關問題為主，可見憂鬱情況所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衛福部，2019）。

除了憂鬱問題的普及，憂鬱情況發生年齡的降低也值得關注，近年來，青少年通報憂鬱情緒的情況越見頻繁，青少年的憂鬱問題，可能導致青少年在學校人際關係受挫、學業成績不佳，在家庭中也可能影響其親子關係，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青少年時期是走向成年前的關鍵時期，也是人類身心發展變化相當大的時期，這段時間的發展會對往後的自我身分認同、人格養成立下基礎，在青少年時期，除了要面臨生理上的改變，可能同時也面對著自我認同、同儕相處等問題，

更要面對各種考試的壓力。此時的青少年除了容易受到學校同儕、師長的影響，家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當青少年面對種種壓力來源與挫敗，而身邊的親人、朋友無法及時提供關心時，可能進而導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受到影響，更可能延伸出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陳思帆、張高賓，2013），進而影響其成年後的行為。此外，近來大學生因憂鬱情緒而釀成悲劇的情況也頻頻發生，其中更不乏就讀名校的大學生，根據統計，自殺年齡介於 15-24 歲的比例逐年增加（衛福部，2019），青少年憂鬱問題與自殺年齡的下降，也讓人反思，這些情況的發生，是否肇因於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只一味地專注於學業成績的提升，卻忽略了對心理問題解決能力的養成，讓這些正值青春年華的學生在遇到憂鬱問題時，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也沒有勇氣向他人求助，而錯了解決問題的時機點，才導致悲劇一再發生。

對大多數人而言，在其成長過程中，家庭是最常接觸的場所，家不只是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也是個人成長的起點，對成長中的青少年而言，良好的家庭背景不僅止於優渥的生活條件，家庭功能的完善與否，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個家庭中，良好的親子關係與互動方式，能夠提供給青少年情緒發展支柱（張高賓，2004），若家庭能夠發揮正常的功能，提供青少年適當的支持與關懷，不僅能幫助青少年度過成長過程中的徬徨無措，也能幫助青少年擁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

由此可見，家庭除了對學業成績帶來影響之外，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同樣意義重大。較優渥的家庭經濟狀況，除了讓父母有能力提供子女更豐富的學習資源、更好的學習環境，家庭經濟的穩定，也讓青少年能安心學習，而不必分心擔心經濟來源；相對而言，當家庭經濟狀況較差時，青少年可能會面臨學習資源的缺乏，家中經濟狀況的不穩定，也可能對青少年帶來額外的壓力，進而影響子女的心理健康狀況（林俊瑩、吳裕益，2007；陳毓文，2004）。

家庭對青少年的影響，除了經濟層面外，父母與青少年的互動方式也會對

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帶來影響，父母正確的教養方式，會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帶來正面的影響，在子女的教養上，父母若能給予青少年充分的自由、適時的鼓勵子女，並且設定合理的規範，建立良好的親子互動，並且在子女遇到挫折時，能夠及時提供幫助，這些行為都對親子關係的培養有所助益，也能幫助青少年擁有良好的社交關係，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相較之下，若親子間的互動方式是嚴格的命令關係，子女與父母間只有絕對的服從而缺少溝通，或者對子女的教養採取放任態度，任由子女任性妄為而不進行監督的責任，都可能對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在不良的親子關係下，不論是不當的管教方式、對青少年過多的限制，或者對青少年過度的放任，種種不良的教養方式，不僅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無益，還可能為青少年帶來更多壓力，導致憂鬱情緒的產生 (Dangi & Witt, 2016)。

對青少年而言，在成長的過程中，良好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都是有所助益的，但兩者卻難以兼顧，隨著時代變化，我國女性就業比例在民國 101 年時突破 50%，並且逐年上升 (主計處，2016)。雙薪家庭的比例逐漸增加，對家庭背景條件的提升，或許的確能帶來正面影響，但當父母致力於工作，以換取良好的社經地位、提供子女優渥的家庭背景時，是否也可能因此忽略了對青春子女子女的陪伴，而未能提供適當的照顧，即使高社經地位能對子女的學業成績帶來正面影響，父母在子女成長階段的缺席，是否可能導致親子間的關係不佳，進而對青少年時期子女的心理健康狀態產生負面的影響，讓青少年產生憂鬱情緒，甚至進而影響其成年後的生活？

除了雙薪家庭比例逐漸增加，雙親皆致力於工作可能導致家庭功能受到影響，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2019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在 2019 年的離婚率為千分之 2.31 (內政部，2019)，父母的離婚造成家庭結構改變，伴隨而來給單親家庭子女的影響不容小覷，父母離婚事實勢必會對青少年的心理產生衝擊，進而導致心理及情緒問題的產生。另外，相較於雙親家庭，單親家庭子女更容易出

現偏差行為，並且，單親家庭意味著只有一份經濟來源，相較於雙親家庭，可能也較容易出現經濟上的弱勢，並進而對子女帶來額外的壓力（張華甄，2012；鄭麗珍，2001），在青少年時期面臨了心理層面的衝擊及經濟條件的弱勢，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及憂鬱情緒的產生，都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過去的諸多文獻都討論了父母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對子女學業成績、未來就業的影響，以及父母的教養方式、親子關係、家庭功能等對子女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但不論是實質上提供子女良好的家庭背景，給予子女充分的資源，讓子女可以無憂無慮的成長，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在生活中為子女訂定規範，並且在心理層面上成為子女的依靠，對處於成長階段的青少年而言都很重要。

良好的家庭背景或許能讓子女在生活上不虞匱乏，但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的徬徨，卻可能無處安放，進而導致憂鬱情緒的產生，憂鬱情緒除了對心理健康帶來影響，也可能進而影響了青少年的生活，導致青少年不喜歡去學校上學，而對學業成績帶來影響，可見，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良好的家庭背景、物質條件、安穩的生活環境等對青少年固然重要，父母親的陪伴與關懷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同樣舉足輕重，這些因素在青少年的生活中都會互相影響，但在過去的文獻中，較多是探討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的影響，以及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的影響，較少探討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以及親子關係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是以這些因素間如何互相影響，即為本文所關注的重點。

## 第二節、研究目的

從前述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家庭背景不論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或者憂鬱情緒，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同時，家庭間的親子關係、互動方式是否恰當對青少年也十分重要，故本研究將檢視家庭背景、親子關係與學業成績、憂鬱情緒間的相關性，主要目的如下所述：

- 一、探討家庭背景對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影響
- 二、探討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影響
- 三、探討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影響，以及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是否會強化或削弱另一變項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學業成績的探討，多著重於家庭背景層面如父母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結構等因素對學業成績的影響；而對於心理狀況的探討，則多著重於親子關係、父母教養方式、與同儕相處等因素對心理狀態的影響，但對於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心理狀態以及親子關係是否對學業成績帶來影響，則較少討論，除了家庭背景之外，親子關係是否也會對子女的學業成績帶來影響，而家庭背景是否也同時會影響子女的心理健康狀況，即為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

另外，過去許多研究皆著重於家庭背景對高等教育階段的影響，本研究認為青少年階段是個人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一段時期，在台灣的升學制度下，國高中階段的就學選擇將影響其日後的升學及職涯發展，不同的出身背景，也會反應在就學選擇上。此外，多數台灣的青少年在國中及高中階段都需要參加升學考試，藉由統一的測驗內容，也更便於衡量比較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差異，因而本文選擇這段時期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健康狀態，也將影

響其日後的人格養成，及成年後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探討在青少年時期，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將會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

過去的諸多研究中都顯示了，良好的家庭背景能夠對子女帶來正面影響，因此，本研究也試圖探討，當家庭背景條件較差時，若父母更致力於親子關係的經營，是否能改善經濟條件上的劣勢對子女的不利影響，即使家庭背景較差，仍舊可以在學業上有優異的表現；而若家庭背景條件本來就好，父母又願意投入大量心力在親子關係的經營，這種家庭中的青少年，是否在各方面都能有更佳的表现。



## 第二章、文獻回顧

### 第一節、學業成績

自從 Coleman 等人在 1966 年教育機會均等報告中指出，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關鍵是家庭因素，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學生，在學業成就上表現也會比較優異後 (Coleman et al., 1966)，後續也有許多研究證明了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績間的關聯性，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等條件通常較高，而這些學生也會有較好的學業成績；相對而言，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等可能條件都不及高社經地位家庭，這些學生的學業成績也會比較差 (Haveman & Wolfe, 1995；Zax & Rees, 2002；林俊瑩、吳裕益，2007；沈暉智、林明仁，2019；黃芳玫、吳齊殷，2010)。

也有學者進一步討論，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子女，其學業成績表現較好的原因，是因為父母將其優良基因遺傳給了子女，讓這些來自高社經家庭的人，本身就具有更好的天賦，還是高社經地位家庭的良好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給子女更好的生活環境、提供更好的成長條件，讓子女可以複製父母的成就。Plug & Vijverberg (2003) 討論了父母教育程度對子女受教育年數的影響，是源自父母將其能力遺傳給子女，還是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能提供給子女較好的生活環境，結果發現父母的遺傳對子女的學業表現有顯著正相關，但也發現除了父母智商的影響外，良好的經濟條件，也有子女的教育成就有正面影響。Tsou, Liu, & Hammitt (2012) 則以領養子女作為觀察對象，以觀察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子女教育成就間的因果關係，結果發現，養父母的教育年數與其領養子女正相關，顯示即使養子女與養父母間沒有血緣關係，良好的家庭背景，仍然會對子女的學業成就帶來正面影響。

就傳統上而言，母親為家庭的主要照護者，而父親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

多是經濟來源的提供者 (Monna & Gauthier, 2008)，雖然隨著時代變化，女性就業比例逐漸提升，但家務上的分工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男性在家中事務所參與的程度，還是低於女性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2000)，孩子在家中有許多時間與母親相處在一起，通常也是由母親負起主要的教養責任，因此，有部分文獻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帶來的影響會大於父親 (Chevalier, Harmon, O' Sullivan, & Walker, 2013)；亦有其他文獻顯示，父親教育程度的高低，會大於母親所帶來的影響，黃芳玫、吳齊殷 (2010) 發現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會對子女的學業成績帶來正向影響，且影響程度會隨父母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大，其中又以父親的影響程度為大。Cobb-Clark & Tekin (2014) 則發現，在家庭中，光是有父親角色的存在，就能夠減少子女偏差行為的產生，其意義更勝於父親對家中經濟貢獻的程度，尤其對兒子而言，影響更為明顯。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儘管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教育都十分重要，但又以父親對兒子、母親對女兒影響更大 (Tsou et al., 2012)。

除了教育程度的影響，家庭社經地位對子女學業成就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父母的社經地位越高，會連帶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也越高 (謝孟穎，2003)。沈暉智、林明仁 (2019) 探討了父母的所得如何影響子女的教育機會，發現家戶所得及資產與高等教育的就讀機會呈現高度相關，父母的所得是影響子女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收入越高之父母也越有能力提供子女良好的教育環境，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對子女之學業成就有其重要性 (吳慧瑛，2007；黃芳玫、吳齊殷，2010)，良好的家庭背景，讓家庭有足夠的財富能夠為子女提供較多的教育資源、固定的讀書場所、課外補習資源等有利條件，父母對子女較高的教育期望，也能幫助子女的學習 (林俊瑩、吳裕益，2007)。另外，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多半也伴隨著高教育程度，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較有能力提供給子女良好的知識背景，父母本身所擁有的知識，也讓其子女在學習上遇到問題時，可以及時得到解答，當遇到問題時可以及時得到解答，就



加強了其子女對教育的積極性（周新富，2008）。

相對而言，低社經地位的父母，時常伴隨著較低的教育程度，通常家庭收入也比較低，儘管父母辛勤工作以換取家庭所需，在家庭缺乏資金來源的情況下，教育的花費可能就佔據了薪資收入的很大比例，讓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僅能滿足子女的基本生活需求，而沒有餘裕為子女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Lareau, 2002）。較低的教育程度也讓父母無法在子女的學習上提供幫助，在學習上遭遇的挫敗，也會讓孩子失去學習的意願，缺乏經濟資源會使青少年的生活帶來種種挑戰，不僅在生活資源上較為匱乏，對青少年本身而言，也可能帶來如較低的認知能力、學習成績、身心健康等負面影響（Cobb-Clark, Ryan, & Sartbayeva, 2012）。此外，單親家庭相較於雙親家庭更常出現經濟條件上的不足，且單親家庭的家長需要兼顧工作與子女的教養，也不利於子女的成長，在單親家庭中，又以女性家長單親家庭經濟狀況最差（薛承泰，2000）。

不同的家庭背景也會導致不同的價值觀，讓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有所差異，並進而影響到子女的教育成就。通常家庭背景較優異者，父母的經濟條件及教育程度也較好，因為家庭物質條件較高，家長對子女的期望也較高，而父母的教育期望也會反應在子女的教育成就上；對社經地位較差的父母而言，雖然這些父母可能也對子女有較高的教育期望，卻可能受限於家中經濟條件的不足，無法支持子女的教育需求，導致子女學業成就較低（張芳全，2006；邱仕凱，2018）。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會影響子女的自我期望，出生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子女，對自己也會有較高的教育期望，來自父母的期望，加上對自己課業的要求，都讓這些人在學業上能有更好的表現（Weiser & Riggio, 2010），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衍生而來的各種教育資源的差異，與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條件一樣，都與子女的學業表現有所相關（許崇憲，2002）。

除了家庭背景條件的影響，親子關係的好壞也會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帶來影響，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舉凡家庭結構、親子關係、父母的教養方式、

家庭成員的互動方式等因素，都會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所影響，持續與穩定的親子關係及家庭背景能提供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的必要元素，反之，動盪不安的家庭則對少年發展有負面影響（陳杏容，2016）。親子關係對學業成績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當親子間的關係越緊密，彼此的互動越頻繁，則子女的學習成就越佳，但社經地位較差的學生，多數家長學經歷較差，導致其家庭資源較為匱乏，當父母忙於工作，時常沒有多餘心理經營家庭關係，因而與高社經地位家庭相比，在學習方面會處於較為不利的局面（丁學勤、曾智豐，2013）。

除了父母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父母教育期望、親子關係等原因，尚存在其他與個人相關的因素，也會對學業成績帶來影響。Lin & Liu（2009）使用出生時的體重來觀察健康狀況對青少年時期學業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出生時的體重會對學業成績有正面影響，體重過輕的嬰兒對青少年時期的學業成績有負面影響，另外也發現，受教育年數較少及年紀較輕的母親，也會對新生兒的體重有負面影響，並進而影響子女長大後的學業成績。Fletcher（2011）也發現出生時體重過輕者，在進入青少年時期後，會導致學習障礙以及留級情況的發生。Ding, Lehrer, Rosenquist, & Audrain-McGovern（2009）則討論了個人健康狀況對青少年時期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憂鬱情緒和肥胖的症狀會使女性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受到負面影響，但對男性青少年的影響則較低。曾竣瑋、王鶴森（2012）則觀察了台灣國中生體適能測驗結果與其學業成績間的相關性，發現不論男女，其體育表現都會與學業成績呈正相關，此外女性過重也會對學業表現有負面影響。青春期的健康狀況與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關係密切，當青少年健康狀況不佳時，維持健康或許會比優異的學業表現更加重要，因而降低了教育期望，並進而影響青少年成年後的就業狀況（Hale, Bevilacqua, & Viner, 2015；Jackson, 2009）。此外，學業表現也存在性別差異，由於過去的社會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的態度，因而導致女性的教育程度低於男性，且除了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外，家中兄弟姊妹的數量以及出生序也會對家中資源產生競爭（吳慧

瑛，2007)，這種不同性別間的教育程度差異，普遍存在較早的年代，但隨著觀念改變以及教育的普及，教育程度的性別差異已經漸漸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而消弭（黃芳玫、吳齊殷，2010）。林俊瑩、吳裕益（2007）則是觀察了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對國中學生學業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女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會優於男學生，顯示隨著時代改變，學業成績上的性別差異逐漸消失，甚至女性的學業表現也可能優於男性。

從上述文獻可以發現，舉凡父母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教育期望、親子關係、健康狀況、性別差異等原因，都會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良好的家庭背景固然可以為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帶來正面的影響，但同時，父母亦須努力維持良好的親子關係，提供青少年良好的生活環境與健全的家庭功能，以幫助青少年身心健全的發展。此外，青少年本身的健康狀況、自我期望等因素，也都會對學業成績有所影響，但當父母與青少年都為了達成在學業表現上的成就努力時，是否也會因此而忽略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態，家庭背景、教育期望、親子關係等因素雖然能夠成為提高學業成績的助力，但過高的期待與過度的關懷，也會對青少年帶來壓力，進而導致了憂鬱情緒的產生（楊孟麗，2005）；反之，對低社經地位家庭而言，父母或許無法提供高質量的家庭背景與知識涵養，但或許可以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提供較多的陪伴，父母親較低的教育期望，也讓青少年不會有過大的壓力，甚至可能因而有超乎期望的教育成就，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當中，藉由親子關係的經營，確保青少年心理狀態的健全發展，避免青少年產生憂鬱情緒，也能避免學習狀態受到心理狀態所影響，因此，除了家庭背景對青少年的影響，親子關係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學習成績，也值得討論。

## 第二節、憂鬱情緒

在生命的發展過程中，因為生理或外在環境的變化，存在幾個萌發憂鬱情緒的高危險期，而青少年時期是人類身心發展變化最大的時期（徐世杰，1993），也是由而兒童走向成人階段的關鍵發展階段，這段時間的發展會對往後的自我身分認同、人格養成立下基礎，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在生活中，常需要面對許多不同的壓力，舉凡同儕相處、課業壓力、家庭狀況、生理上的轉變等，對青少年而言都是壓力的來源，且根據對過往文獻的檢閱，女性相較於男性更容易受到憂鬱情緒的困擾（Cyranski, Frank, Young, & Shear, 2000；Girgus & Yang, 2015；王齡竟、陳毓文，2010；陳毓文，2004），而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女性，其憂鬱情緒的表現會更加明顯高於男性（Salk, Petersen, Abramson, & Hyde, 2016）。當青少年承受了來自各方的壓力，自身的能力卻可能不足以應付生活中的各項挑戰，此時若身邊的家人朋友無法及時提供青少年所需的關心，可能會因而導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受到影響，以致憂鬱情緒的產生，並進而導致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長期而言，甚至會影響到青少年成年後的行為。

自尊和憂鬱被視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兩項重要內涵，自尊是指青少年正向的心理素質，憂鬱則是負向的情緒狀態（江守峻、陳婉真，2018），青少年自尊是指青少年的自我價值感，代表青少年對自我的正面評價及肯定程度；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則是指負向的情緒特徵，個人出現生理上的不適或是情緒上的抑鬱，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可能是短期的情緒狀態，也可能是長期的負面情緒影響（Petersen et al., 1993）。近年來青少年族群的憂鬱程度有逐漸攀升的趨勢，憂鬱情緒發生的年齡層也逐漸下降（Prosser & McArdle, 1996），青少年的憂鬱情緒，輕者可能會影響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嚴重者甚至產生自殺傾向，因此青少年憂鬱情緒可以反映出青少年受心理健康困擾的程度，本研究主要關注的重點為青少年的憂鬱情緒。

伴隨著青少年發展的特性與社會環境的改變，青少年的發展問題除了受到同儕、生活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偏差行為，舉凡憂鬱、焦慮等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症狀亦時有所聞（陳毓文，2004），青少年時期不僅是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也是最容易受到他人影響的時刻，青少年除了花費大量時間在學校與同儕相處，也有大半時間與家人一起度過，家庭是青少年生活學習最重要的場所，穩定的家庭環境是提供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的必要元素，反之，動盪不安的家庭對青少年的發展有負面影響（陳杏容，2016）。青少年的人格養成、行為規範、人際相處等生活經驗，都與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密切，良好的親子關係與家庭氣氛，可以提供青少年舒適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學習楷模，成為青少年成長的依靠，幫助青少年養成健全的人格（張高賓，2004）。

親子關係的融洽與否、父母的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等因素，都與青少年的生活息息相關。親子關係的不融洽，不僅會讓青少年對家庭產生排斥，也可能促使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Robertson & Simons（1989）的研究發現，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會影響到子女看待世界的方式，父母悲觀的生活態度以及對子女的過度的指責與批評，不僅對子女的憂鬱情緒有直接影響，對子女的自尊心也存在間接影響，而自尊心的低落，則可能引發負面情緒。陳思帆、張高賓（2013）的研究也發現，國中生的家庭功能與憂鬱傾向有相關性，家庭功能越高的青少年，雖然家長在子女的生活上妥善地提供了一切所需，但或許同時也代表了父母對子女過度的控管以及子女高度的順從，以致於親子間缺乏溝通的管道與機會，當子女無法發表自己的意見、情緒也沒有宣洩的出口，長久下來可能導致負面效果，導致子女憂鬱傾向的提高。林耀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則發現，衝突的親子關係，會導致家庭功能下降，並且母親的高度關懷可能無法提升親子關係，甚至會導致反效果，造成青少年的壓力。王齡竟、陳毓文（2010）發現，家庭中的雙親衝突或親子衝突，不論其衝突程度的高低，都會讓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受到影響。

由此可見，正確且適當的教養方式，不僅對青少年的成長有所助益，對親子關係的提升，也有所幫助。父母的教養方式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分別為開明權威型（authoritative）、權威專制型（authoritarian）、寬容放任型

（permissive）、忽視型（neglectful），開明權威型的父母給予子女相當大的自由，他們會對子女的教養訂定規範，但同時也會詳細地向子女說明限制的理由，在與子女的相處上也會分享彼此的想法，並且在子女面對問題時給予建議，幫助他們做出決定；權威專制型的父母，則會嚴格的對子女訂定各種規範，子女必須服從父母的決定，一旦違反父母的要求就會遭受懲罰，親子間的互動是命令關係，父母對子女缺乏關心，子女在生活上也缺乏父母的支持；寬容放任型的父母認為子女的開心是最重要的，父母不想破壞親子關係，任由子女予取予求，雖然給予子女大量的關心與愛護，在生活上卻缺乏規範；忽視型的父母則對子女的任何事都漠不關心，也不認為管教子女是自己的責任，父母與子女間缺乏情感交流，親子關係也因而疏離（Baumrind, 1966; Nyarko, 2011; 陳婉琪、徐崇倫，2011）。

在這幾種教養方式中，以開明權威型的教養方式最為良好，陳婉琪、徐崇倫（2011）發現父母親的關懷與支持，會對子女的心理健康帶來正面影響，而過於嚴厲的教養方式，則會對子女帶來負面影響，父母在子女的教養上，不必過度的嚴厲控管，只要適度的監督子女的言行舉止，不僅可以避免子女出現偏差行為，也能夠減輕子女憂鬱情緒，此外，對子女適當的關懷，也能緩衝因為嚴格的教育方式所帶來的不良影響。開明權威型的父母在與子女的相處過程中，能夠訂定合理的規範，同時也給於子女充分的自由，在子女遇到問題時，能夠為他們提供意見，在子女遭遇挫折時，也能夠提供安慰，這種教養方式對親子關係的培養有所助益，合理的規範與適當的親子關係都能幫助青少年在遭遇問題時，能夠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問題，減少憂鬱情緒的產生，因此，父母適當的教養方式，不只能夠幫助青少年的人格養成，也可以減少青少年在成長過

程中憂鬱情緒的產生。

就家庭社經地位的差異而言，江守峻、陳婉真（2018）的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受到父母影響甚大，高社經地位的青少年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緊密連結，相對而言，低社經地位的青少年與親子關係則不若高社經地位青少年緊密。張高賓（2004）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家庭能提供給青少年的心理依靠也有所差異，高社經地位的家庭相較低社經地位家庭，有較好的關懷溝通能力及較少的衝突，在家庭休閒活動上，也表現得比低社經地位家庭好。

楊孟麗（2005）的研究則顯示，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狀況未必也會比較好，因為高收入的父母親對子女會有較高的教育期望，連帶子女也會對自己有高教育期望，種種壓力皆不利於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追求教育成就的壓力，可能讓學生對自己的表現有著高度期望，但過高的教育期望卻可能反而對心理狀態產生負面影響，使得學習成就與心理健康產生負面關係，尤其對自我教育期望較高者，可能更害怕失敗，也連帶產生了更大的壓力，但教育期望較低者，情緒可能較不會受到學習成就而左右，反而能夠擁有較健康的心理狀態，可見教育期望對學業成績或許有正面影響，但對青少年心理狀態卻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過高的教育期望可能反而會使青少年產生憂鬱情緒（Yi, Wu, Chang, & Chang, 2009）。

相對於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低社經地位家庭必須面對家庭的經濟壓力，當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工作上，就容易疏忽親子關係的建立，而經濟上的匱乏，也會使得青少年處於遭受憂鬱情緒的危險之中（Eamon, 2002；黃昱得，2014）。朱崇信（2005）的研究發現家庭經濟壓力越高、父母提供的支持越低的青少年，其憂鬱情緒越高。此外，單親家庭相較雙親家庭更常出現經濟條件上的不足，單親家庭的家長因為需要兼顧工作與子女的教養，讓其職業選擇有限，在缺少教育訓練與升遷機會下，薪資自然較低，且單親家庭家長需同時負

擔照顧家庭與經濟來源的雙重壓力，也讓單親家庭不利於親子關係的經營（薛承泰，2000）。羅詩婷（2015）發現，相較於身處雙親家庭，身處單親家庭的青少年，因為家庭的不完整，容易造成家長與子女雙方的心理壓力，讓青少年的憂鬱情緒更加嚴重，因而，單親家庭的子女相較雙親家庭，存在較多的心理及情緒障礙。

對教育成就的重視，讓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間的關係也變得複雜，追求教育成就的壓力，可能讓青少年對自己的表現有著高度期望，但過高的教育期望卻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使得學業成績與心理健康產生負面關係，因此學業成績表現的越好，心理所承受的壓力也可能越高，也可能因而導致負面情緒；但教育期望較低者，情緒可能較不會受到學習成就而左右，反而能夠擁有較健康的心理狀態。Yi, Wu, Chang, & Chang（2009）對國高中的青少年進行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所影響，學業成績較好的學生更會對教育競爭感到憂鬱，且憂鬱情緒會隨著升學考試接近而提升，其中又以國中時期的青少年會比高中時期的青少年更加憂鬱。Fröjd et al.（2008）也發現，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對在學校的表現有負面影響，心情上的憂鬱會導致青少年的關注度下降、對生活失去熱情，並可能讓青少年因為感覺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在生活上付出較少的努力，這種消極的態度也可能會反映在青少年的實際表現上，讓青少年的學業成績低落。

青少年時期的憂鬱情緒，也會影響到成年後的心理與學業狀況，大學時代是青春期過渡到成年期的關鍵發展時期，Bruffaerts et al.（2018）發現青春期的憂鬱狀態，會連帶影響到成年後的憂鬱情緒，也發現大學生的憂鬱情緒，與其學業表現的低落有關。Hysenbegasi, Hass, & Rowland（2005）也發現大學生的憂鬱與學業表現相關，憂鬱情緒不只會讓大學生的學業成績下降，且憂鬱情緒的影響也可能會延伸至工作及家庭。

綜上所述，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有許多因素都會對青少年帶來各種影



響，家庭背景不僅會影響到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未來成就，安穩的家庭背景也會減少青少年憂鬱情緒的產生，但在維持良好家庭背景的同時，父母也可能因為花費了大量時間工作，以致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缺席，在經濟維持上的兢兢業業，也可能讓父母產生憂鬱情緒，進而導致子女憂鬱情緒的產生。此外，良好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心理健康狀態也十分重要，父母對子女適度的管教與關懷，不僅能夠避免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也能減少子女憂鬱情緒的產生，許多家長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工作上，但卻因而疏忽了家庭氣氛的營造，導致親子關係的疏離，因此，在經濟條件的維持與親子關係的維繫上，如何達到平衡，就是個值得關注的重點。



## 第三章、研究方法

### 第一節、研究資料

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簡稱「臺灣青少年計畫」，英文名稱為 Taiwan Youth Project（簡稱 TYP），該計畫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如何受到家庭、學校與社區的交互影響，以致影響到個人在成長時的身心調適。

台灣青少年計畫以台北市、台北縣（新北市）及宜蘭縣的國中學生為研究母體，在台北市、台北縣抽取國一和國三兩個年級的學生各 1000 名，宜蘭縣國一和國三各 800 名學生，估計總樣本數為 5600 名學生。第一階段先以都市化程度作分層，第二階段再依據各分層所需的樣本數，在各分層中選取足夠數量的受訪學校及受訪班，最後共抽取 40 所學校，共 162 班，學生總人數為 5580 人。兩個世代的樣本在第一次被調查時，都來自同樣的抽樣學校。至 2009 年第一階段結束時，國一學生已經有九波資料，國三學生則有八波的資料（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2020）。

本研究選取「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中國一樣本的第三波（2002 年 3 月）、第四波（2002 年 10 月）與第六波（2005 年）的學生問卷以及第三波（2002 年）與第六波（2005 年）家長問卷的資料作為分析樣本，以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作為解釋變數，探討其與以下兩種被解釋變數——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憂鬱情緒——之間的相關性，觀察在青少年國三（第三波）與高三（第六波）時，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帶來的影響有何不同，以及隨著青少年的年紀漸長，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青少年所帶來的影響是否有所改變。並使用個人固定效果（Individual Fixed Effects）模型，處理潛在之內生性問題。

## 第二節、變數選取

### 一、解釋變數

本研究解釋變數為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

#### (一) 家庭背景

本研究參照林俊瑩、黃毅志（2008）的研究，以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衡量家庭背景，並將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直接加總為家庭背景分數。

父母教育程度分為國小及以下、國中、高中職、大學及專科、碩士以上，依填答項目依序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家庭月收入分為 3 萬以下、3-5 萬、5-7 萬、7-9 萬、9-11 萬、11-13 萬、13-15 萬、15 萬以上，依填答項目由低至高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6 分、7 分、8 分。家庭背景分數由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月收入的得分加總而成。

#### (二) 親子關係

本研究主要想探討親子間的互動關係，父母與子女間平時的互動，可以讓彼此感受到相互依賴的情感，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亦會影響到子女的學業表現及身心發展（丁學勤、曾智豐，2013），本研究的親子關係是由 TYP 學生問卷第三波（國三）與第六波（高三）中「下列關於你家中生活的情形，你認為符不符合？」一題，青少年針對以下題項：「作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量」、「當有家庭活動時，我們家每個人都會參加」、「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填答，問卷填答方式 1 代表「很符合」2 代表「還算符合」3 代表「不太符合」4 代表「很不符合」，為了解此 4 題題目之信度，採內部一致性分析，此 4 題在兩波資料中均具充分內部一致性（ $\alpha$  值

=.79, .86), 本研究採反向計分, 答 1 者給 4 分, 將此 4 題相加, 最低為 4 分, 最高為 16 分, 得分高者表示親子關係越為密切, 反之亦然。

為了後續分析可以比較兩種解釋變數各自之影響力, 本研究亦將家庭背景分數與親子關係分數進行標準化。

## 二、被解釋變數

被解釋變數為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

### (一) 青少年學業成績

青少年學業成績為第四波學生問卷(國三)中青少年所填答的基測分數與第六波學生問卷(高三)青少年所填答之學測成績。本文並對基測分數及學測分數進行標準化, 以利比較兩個不同階段的家庭背景及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影響。

### (二) 憂鬱情緒

自尊和憂鬱被視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兩項重要內涵, 自尊是青少年正向的心理素質, 憂鬱則是負向的情緒狀態。憂鬱情緒包括了孤獨、鬱卒或擔心過度等負面的心理狀態, 以及頭痛、頭暈、失眠等生理上的不舒服, 多種面向綜合而成的心理負面狀態, 會讓人感到身體和心理上的不適(羅詩婷, 2015), 本研究主要關注的重點為青少年的憂鬱情緒。

在本研究中, 憂鬱情緒是根據 TYP 學生問卷第三波(國三)及第六波(高三)中「過去一個星期, 你有沒有下列不舒服的情形? 不舒服的程度如何?」中 16 題題目而得。此變項 16 題題目分別為 1「頭痛」、2「頭暈」、3「孤獨」、4「鬱卒」、5「擔心過度」、6「肌肉痠痛」、7「失眠、不易入睡」、8「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刺」、9「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10「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11「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12「一大早就醒了, 想再睡又睡不著」、13「睡眠不安穩或一直醒過來」、14

「常常和別人爭吵」、15「尖聲大叫或摔東西」、16「不想活了」。問卷填答方式 1 代表「沒有」2 代表「有，有點」3 代表「有，普通」4 代表「有，嚴重」5 代表「有，很嚴重」。為了解此 16 題題目之信度，採內部一致性分析，此 16 題在兩波資料中均具充分內部一致性 ( $\alpha$  值=.88, .87)，本研究採反向計分，答 1 者給 5 分，將此 16 題相加，最低為 16 分，最高為 80 分，分數越低代表憂鬱程度越高，青少年較為憂鬱，反之，分數越高代表憂鬱情緒程度越低，青少年較不憂鬱。為了後續分析可以比較兩種解釋變數與憂鬱情緒之關聯，本研究亦將憂鬱情緒進行標準化。

### 三、控制變數

#### (一) 性別

以男性為 0，女性為 1。

#### (二) 家庭結構

在本研究中，家庭結構是根據 TYP 學生問卷第三波（國三）與第六波（高三）中「你目前是否與爸爸、媽媽同住？」予以分析，原問卷中答案 1 代表「與爸媽（生父、生母）均同住」、2 代表「與爸爸、繼母同住」、3 代表「與媽媽、繼父同住」、4 代表「與爸爸同住」、5 代表「與媽媽同住」6 代表「與其他人同住」，本研究主要探討是否與父母同住的差別，因此將樣本分為 0 代表「與父母同住」及 1 代表「單親及其他」。

#### (三) 父母親年齡

父母親的年齡來自其在第三波（2002 年）及第六波（2005 年）TYP 家長問卷中所填答的出生年，並計算出其當時的實際年齡。

#### (四) 學校所在地

學校所在地來自 TYP 學生問卷第三波（國三）與第六波（高

三) 中，青少年填答其就讀學校所在地區，分別為「台北市」、「台北縣」、「宜蘭縣」。

#### (五) 青少年健康狀況

在本研究中，青少年健康狀況是根據 TYP 學生問卷第三波（國三）與第六波（高三）中「你的健康狀況如何？」青少年填答狀況予以分析，原問卷回答方式為 1 代表「極佳」、2 代表「很好」、3 代表「還好」、4 代表「不太好」、5 代表「很不好」，本研究採反向計分，答 1 者給 5 分，分數越高者青少年健康狀況越佳。



### 第三節、敘述統計

表 1 為本研究之敘述統計。首先，在國三樣本中男性與女性比例約各佔一半。家庭月收入部分，3 萬以下的家庭占了 24.37%，其他大致分布在 3 萬到 9 萬的區間，這三個區間的家庭約佔了 60%，家庭月收入 9 萬以上的家庭則約有 15%。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34.97%），國中以下約 44%，大學以上學歷只佔了約 21%。母親的教育程度也是以高中職為最多（38.71%），國中以下約 47%，而大學以上學歷的人數則只佔了約 14%。在家庭結構部分，有超過八成（83.45%）的青少年都與父母雙方同住，單親及其他佔了 16.55%。青少年就讀的學校位於台北市（38.7%）與台北縣（38.89%）比例相近，位於宜蘭縣的青少年比例則略少（22.41%）。青少年的健康狀況，僅有不到一成（7.39%）的青少年健康狀況較為不佳，多數青少年健康狀況尚可。

高三部分，樣本中男性與女性比例約各佔一半。家庭月收入 3 萬以下的家庭占 16.46%，其他大致分布於 3 萬到 9 萬之間，這三個區間的家庭約佔了約 65%，家庭月收入 9 萬以上的家庭則約占 18%。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最多數（33.03%），國中以下約 43%，大學以上學歷則佔了約 24%，母親的教育程度也是以高中職為最多（35.21%），國中以下約 47%，大學以上學歷約 17%。在家庭結構部分，有約八成（80.67%）的青少年都與父母雙方同住。青少年就讀學校位於台北市（36.53%）與台北縣（35.32%）比例相近，位於宜蘭縣的青少年比例則略少（28.15%）。青少年的健康狀況，只有不到一成（7.67%）的青少年健康狀況較為不佳，多數青少年健康狀況尚可。

整體而言，高三與國三時相比，家庭月收入有增加的趨勢，而父母親教育程度比例的變化，可能跟樣本的變化有關。在家庭結構部分，這段時期的青少年多數與父母雙方同住。青少年就讀的學校，因為抽樣人數差異，以位於宜蘭縣者最少。青少年的健康狀況不論是在國三或高三時都不錯。

表 1 國三、高三敘述統計

變數	國三樣本數	%	高三樣本數	%
性別	2664		1825	
男		51.31		50.96
女		48.69		49.04
家庭月收入	1896		1677	
NT\$30,000 以下		24.37		16.46
NT\$30,000-NT\$49,999		17.62		27.19
NT\$50,000-NT\$69,999		28.22		25.76
NT\$70,000-NT\$89,999		15.14		12.64
NT\$90,000-NT\$109,999		10.28		9.6
NT\$110,000-NT\$129,999		1.64		3.22
NT\$130,000-NT\$149,999		0.58		1.19
NT\$150,000 以上		2.16		3.94
父親教育程度	2542		1786	
國小及以下		15.85		14.84
國中		27.85		27.72
高中職		34.97		33.03
大學、專科		17.9		21.33
碩士以上		3.42		3.08
母親教育程度	2550		1778	
國小及以下		20.47		19.35
國中		26.59		27.9
高中職		38.71		35.21
大學、專科		13.14		16.54
碩士以上		1.1		1
家庭結構	2664		1826	
與父母同住		83.45		80.67
單親與其他		16.55		19.33
學校所在地	2664		1826	
台北市		38.7		36.53
台北縣		38.89		35.32
宜蘭縣		22.41		28.15
青少年健康狀況	2652		1825	
很不好		0.72		0.49
不太好		6.67		7.18
還好		36.76		43.67
很好		43.46		41.32
極佳		13.39		7.34



表 2 中可以看到國三時，父親年齡最低為 34 歲最高則為 79 歲，平均年齡約 45 歲；母親年齡最低為 32 歲最高則為 72 歲，平均年齡約為 42 歲。親子關係部分，最低為 4 分，最高則為 16 分，親子關係平均約 11.01 分，標準化分數最低為-2.7 分，最高為 1.92 分。家庭背景分數最低為 3 分，最高為 18 分，平均 8.02 分，標準化分數最低為-1.67 分，最高為 3.33 分。

高三時，父親年齡最低為 33 歲最高則為 79 歲，平均年齡約 48 歲；母親年齡最低為 33 歲最高則為 59 歲，平均年齡約 45 歲。親子關係部分，最低為 4 分，最高則為 16 分，親子關係平均約 11.13 分，標準化分數最低為-2.73 分，最高為 1.88 分；家庭背景分數最低為 4 分，最高為 18 分，平均 8.36 分，標準化分數最低為-1.8 分，最高為 3.2 分。

表 2 國三、高三敘述統計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國三					
父親年齡	1873	45.43	4.55	34	79
母親年齡	1913	42.41	4.14	32	72
親子關係	2659	11.01	2.63	4	16
親子關係（標準化）	2659	0.01	1.01	-2.7	1.92
家庭背景	1747	8.02	2.95	3	18
家庭背景（標準化）	1747	0.01	0.98	-1.67	3.33
高三					
父親年齡	1676	48.44	4.67	33	79
母親年齡	1727	45.27	3.98	33	59
親子關係	1826	11.13	2.6	4	16
親子關係（標準化）	1826	0.01	1	-2.73	1.88
家庭背景	1521	8.36	3.05	3	18
家庭背景（標準化）	1521	-0.01	1.02	-1.8	3.2

圖 1 為親子關係 4 個題目青少年的回答狀況。國三部分，在「作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量」一題，填答「很不符合」(5.03%) 跟「不太符合」(22.22%) 的青少年共 27.25%，填答「還算符合」(55.14%) 跟「很符合」(17.61%) 的青少年共 72.75%，顯示多數青少年在國三時，在遭遇問題時，會與家人商量後再做出決定。在「當有家庭活動時，我們家每個人都會參加」一題，填答「很不符合」(10.36%) 跟「不太符合」(36.88%) 的青少年共 47.24%，填答「還算符合」(39.47%) 跟「很符合」(13.29%) 的青少年則共 52.76%，青少年在國三時，家人參與家庭活動與否的比例約各佔一半，多數人的家庭互動尚可。在「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一題，填答「很不符合」(9.17%) 跟「不太符合」(28.03%) 的青少年共 37.2%，填答「還算符合」(43.97%) 跟「很符合」(18.83%) 的青少年則共 62.8%，多數國三時的青少年在受到挫折時，家人可以為他們提供慰藉。在「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填答「很不符合」(7.89%) 跟「不太符合」(21.1%) 的青少年共 28.99%，填答「還算符合」(46.56%) 跟「很符合」(24.45%) 的青少年則共 71.01%，顯示多數青少年認為他的家人是可以依賴的。

整體而言，樣本中的青少年在國三時，除了在家庭活動的參與部分，家人參與與否的比例約各一半，多數青少年在國三時若遇到問題，會願意與家人一同討論，以尋求解決的方法，在遭遇挫折或需要幫助時，家人也能夠給予適當的幫助與安慰，顯示樣本中的青少年在國三時親子關係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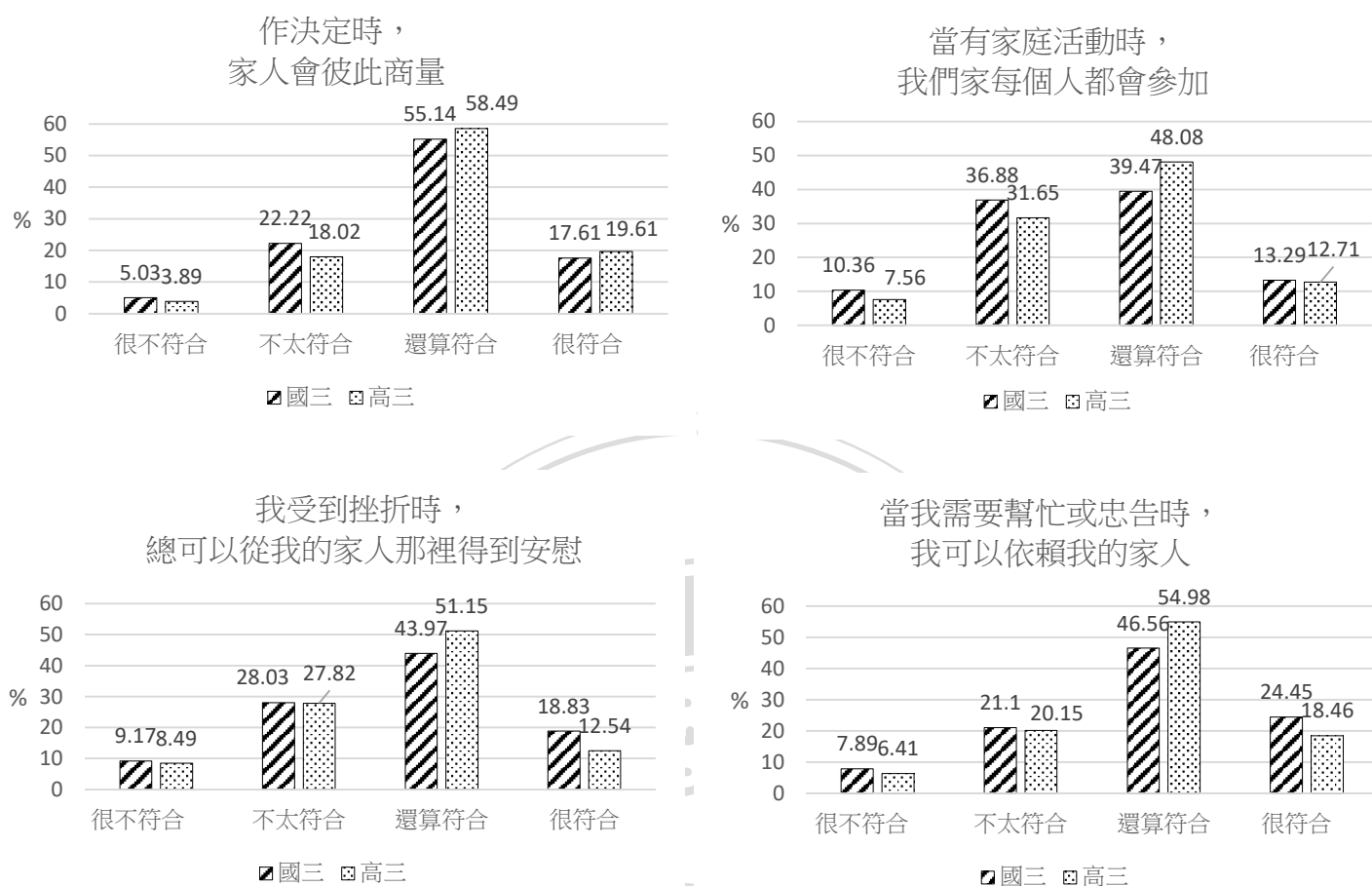
高三部分，在「作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量」一題，填答「很不符合」(3.89%) 跟「不太符合」(18.02%) 的青少年共 21.91%，填答「還算符合」(58.49%) 跟「很符合」(19.61%) 的青少年共 78.1%，顯示多數高三時的青少年，在決定要事時，會與家人一同討論再做出決定。在「當有家庭活動時，我們家每個人都會參加」一題，填答「很不符合」(7.56%) 跟「不太符合」

(31.65%) 的青少年共 39.21%，填答「還算符合」(48.08%) 跟「很符合」(12.71%) 的青少年則共計 60.79%，顯示多數青少年在高三時，家人都會參與家庭活動。在「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一題，填答「很不符合」(8.49%) 跟「不太符合」(27.82%) 的青少年共 36.31%，填答「還算符合」(51.15%) 跟「很符合」(12.54%) 的青少年則共 63.69%，多數高三時的青少年在受到挫折時，家人可以為他們提供慰藉。在「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填答「很不符合」(6.41%) 跟「不太符合」(20.15%) 的青少年共 26.56%，填答「還算符合」(54.98%) 跟「很符合」(18.46%) 的青少年則約占 73.44%，多數高三時的青少年認為他的家人是可以依賴的。

整體而言，樣本中的青少年在高三時，多數在遇到要做決定或是生活遭遇困難的時候，都會向家人尋求協助，而家人也能夠給予青少年所需的幫助及安慰，在有家庭活動時多數青少年的家庭成員也都會參與，顯示樣本中青少年在高三時親子關係密切。

若比較國三與高三兩段時期，則會發現在四項題目中，青少年填答「還算符合」跟「很符合」者的比例都比填答「不太符合」跟「很不符合」者高，顯示樣本中的青少年不論在國三或高三時，其親子關係一向密切。另外，高三時的青少年在四道題目中，填答符合者（還算符合、很符合）的比例都高於國三時，顯示隨著時間改變，樣本中的青少年，其親子關係一向密切，且到高三時略微提升。根據對相關文獻的檢閱，良好的親子關係、家庭氣氛、青少年遭遇挫折時家人所提供的幫助與關懷、家庭中良好的互動與親子交流等因素，都會對青少年的成長有所助益，幫助青少年養成健全的人格。

圖 1 親子關係相關變數次數分布圖



從表 3 中可以看到，國三（2002 年）時的基測總分為 312 分，樣本中最高分為 289 分，最低為 30 分，平均分數為 168 分，將基測分數標準化後，標準化分數最高為 2.26，最低為-2.58。高三（2005 年）學測總分為 75 級分，樣本中最高為 75 級分，最低為 11 級分，平均 46 級分，學測分數標準化後，標準化分數最高為 2.59，最低為-3.07。

青少年的憂鬱情緒由 TYP 問卷中 16 題題目所組成，憂鬱情緒最低為 16 分，最高為 80 分，受試者於題目得分越高，代表其憂鬱情緒越低，青少年越不憂鬱。國三時憂鬱情緒最低為 16 分，最高則為 80 分，平均約 70.63 分，但得到 16 分的只有一人，顯示國三時的青少年或多或少都存在憂鬱情緒。高三時憂鬱情緒最低為 24 分，最高則為 80 分，平均約 71.85 分。整體而言，青少年雖然都有輕微至嚴重的憂鬱情緒，但較多集中於偏低的部分。

表 3 學業成績、憂鬱情緒敘述統計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國三					
基測分數	1409	168.11	53.49	30	289
學業成績 (基測分數標準化)	1409	0.01	1	-2.58	2.26
憂鬱情緒	2638	70.63	8.28	16	80
憂鬱情緒(標準化)	2638	0	1	-6.58	1.13
高三					
學測分數	851	45.71	11.3	11	75
學業成績 (學測分數標準化)	851	0.01	1	-3.07	2.59
憂鬱情緒	1823	71.85	7.42	24	80
憂鬱情緒(標準化)	1823	-0.01	1	-6.47	1.09

## 第四節、估計模型

### 一、最小平方法（OLS 模型）

本研究預計探討之被解釋變數為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本研究將依序將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放入迴歸模型，以觀察這兩項變數對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影響。

首先，在第一階段中分別放入家庭背景及親子關係如式（1），觀察其對兩項被解釋變數的影響，藉此探討，在本樣本中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影響。

$$Y_{it} = \alpha + \beta_1 X_{it} + u_{it} \quad (1)$$

其中， $Y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 $X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 $u$ 為誤差項。

第二階段將加入控制變數如式（2），觀察家庭背景及親子關係與被解釋變數會有什麼變化。

$$Y_{it} = \alpha + \beta_1 X_{it} + \beta_2 control_{it} + u_{it} \quad (2)$$

$Y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 $X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 $control$ 為控制變數，包括了青少年的性別、家庭結構、父母的年齡、學校所在地、青少年的健康狀況； $u$ 為誤差項。

第三階段除了家庭背景及親子關係外，再加入了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交互作用項及控制變數如式（3），藉以觀察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間會有抵銷作用還是有強化效果。

$$Y_{it} = \alpha + \beta_1 X_{it} + \beta_2 inter_{it} + \beta_3 control_{it} + u_{it} \quad (3)$$

$Y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 $X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inter*為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交互作用；*control*為控制變數，包括了青少年的性別、家庭結構、父母的年齡、學校所在地、青少年的健康狀況；*u*為誤差項。

根據相關文獻的檢閱，在估計式（1）中，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應該會對學業表現及減少憂鬱情緒帶來正面影響，即 $\beta_1$ 應為正。估計式（2）再加入其他控制變數，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學業表現與減少憂鬱情緒應該依舊存在著正面影響。最後，估計式（3）中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的交互作用，則是本文主要關注的重點。

## 二、固定效果模型

因為誤差項中可能存在無法觀測的因素對主要觀察變數產生影響，或者因果倒置等內生性（endogeneity）問題，基於本資料可以辨識出同一個學生在不同時間點時，其學業成績、憂鬱情緒、家庭背景、親子關係等情況的變化，本研究亦使用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模型，排除不隨時間變化的個人特性所產生的影響，以處理這些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問題。

固定效果模型如下：

$$Y_{it} = \alpha + \beta_1 X_{it} + \beta_2 inter_{it} + \beta_3 SH_{it} + \theta_i + u_{it} \quad (4)$$

其中， $Y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學習成績與憂鬱情緒； $X_{it}$ 為個人*i*在時間*t*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inter*為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交互作用；

SH（senior high）為高三虛擬變數； $\theta_i$ 為個人固定效果；*u*為誤差項。

## 第四章、實證結果

### 第一節、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之關聯

表 4-1-1 為國三資料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在第 (1) (2) 欄中可以看到，在青少年國三時，家庭背景對基測分數顯著正相關，當家庭背景分數提升 1 分，會提高學業成績提高約 7.54 分，親子關係對基測分數也呈現顯著正相關，當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提升基測分數約 1.79 分。第 (3) (4) 欄則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無顯著相關，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則是顯著正相關，當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改善憂鬱情緒約 0.65 分。

表 4-1-2 則是將基測分數、憂鬱情緒、家庭背景及親子關係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與標準化之前的正負號與顯著性均相符。第 (1) 欄顯示家庭背景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業成績顯著提高 0.423 個標準差。第 (2) (4) 欄可以發現，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業成績提高 0.087 個標準差、憂鬱情緒提高 0.204 個標準差，其幅度低於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性，但統計上仍屬顯著；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則無顯著關聯。



表 4-1-1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

	(1)	(2)	(3)	(4)
	基測分數	基測分數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家庭背景	7.541*** (0.527)		-0.013 (0.068)	
親子關係		1.793*** (0.555)		0.652*** (0.060)
常數項	107.220*** (4.572)	148.366*** (6.311)	70.781*** (0.577)	63.439*** (0.681)
N	969	1398	1727	2634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4-1-2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1)	(2)	(3)	(4)
	學業成績 (標準化)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家庭背景 (標準化)	0.423*** (0.030)		-0.005 (0.024)	
親子關係 (標準化)		0.087*** (0.027)		0.204*** (0.019)
常數項	-0.010 (0.029)	-0.000 (0.027)	0.010 (0.024)	0.001 (0.019)
N	969	1398	1727	2634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4-2-1 為國三第二階段加入控制變數後的分析結果。首先在 (1) (2) 欄中可以看到，家庭背景的提升對基測分數依舊呈現正相關，當家庭背景提升 1 分，會提升基測分數約 5.56 分，親子關係對基測分數的提升也呈現正相關，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提升基測分數約 1.46 分；另外，青少年的學校所在地也會對其基測分數有所影響，相較於台北市的國中生，就讀台北縣及宜蘭縣的學校的學生基測分數較低；青少年的健康狀況與基測分數也呈現負相關。第 (3)

(4) 欄中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呈現負相關但並不顯著，但親子關係與憂鬱情緒則呈現正相關，當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提升憂鬱情緒約 0.46 分，改善青少年的憂鬱情緒；相較於男性，國三時的女性憂鬱情緒更為顯著；青少年的健康狀況對憂鬱情緒呈正相關。

表 4-2-2 是將家庭背景、親子關係、基測分數、憂鬱情緒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與標準化之前的正負好與顯著性均相符。第 (1) 欄家庭背景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業成績顯著提高 0.312 個標準差。第 (2) 欄可以看到，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業成績顯著提高 0.071 個標準差。第 (4) 欄則可以看到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憂鬱情緒提升 0.143 個標準差。顯示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顯著相關，但對憂鬱情緒則無顯著關聯；親子關係也會與學業成績有所關連，但幅度不似家庭背景大，與憂鬱情緒則為顯著相關。

結果顯示，在加入控制變數後，家庭背景、親子關係與學業成績呈顯著正相關，親子關係的提升也可以改善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在性別差異上，女性相較於男性憂鬱情緒較嚴重；另外也發現，在學業成績上，就讀學校位於台北縣與宜蘭縣的青少年，其學業成績會低於就讀台北市學校的青少年，顯示在學業表現上或許存在著城鄉差距，但就讀宜蘭縣學校的學生，憂鬱情緒分數相較於台北市的學生高，或許宜蘭縣的學生學業表現比不上台北市的學生，但卻比較不憂鬱；另外健康狀況提升則對學業成績呈負相關，這點與過去的研究有所不同，但健康分數的提升則與憂鬱情緒呈現正相關。

表 4-2-1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

	(1)	(2)	(3)	(4)
	基測分數	基測分數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家庭背景	5.563*** (0.589)		0.005 (0.068)	
親子關係		1.458** (0.628)		0.457*** (0.070)
女生	1.409 (3.267)	-0.003 (3.254)	-0.906** (0.391)	-1.108*** (0.367)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5.250 (7.267)	-6.032 (6.745)	-1.129 (0.820)	-0.365 (0.726)
母親年齡	1.022* (0.574)	1.426** (0.565)	-0.056 (0.066)	-0.058 (0.059)
父親年齡	-0.115 (0.474)	-0.456 (0.472)	0.031 (0.057)	0.050 (0.052)
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11.380*** (4.048)	-22.416*** (3.812)	-0.356 (0.464)	0.084 (0.423)
宜蘭縣	-29.033*** (4.364)	-46.085*** (3.938)	0.689 (0.507)	0.962** (0.455)
青少年健康狀況	-6.599*** (2.032)	-7.675*** (2.056)	3.876*** (0.241)	3.628*** (0.230)
常數項	121.702*** (21.672)	163.351*** (21.088)	58.076*** (2.519)	52.993*** (2.371)
N	904	988	1588	1751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4-2-2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1)	(2)	(3)	(4)
	學業成績 (標準化)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家庭背景（標準化）	0.312*** (0.033)		0.002 (0.025)	
親子關係（標準化）		0.071** (0.031)		0.143*** (0.022)
女生	0.026 (0.061)	-0.000 (0.061)	-0.109** (0.047)	-0.133*** (0.044)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0.098 (0.136)	-0.113 (0.126)	-0.136 (0.099)	-0.044 (0.087)
母親年齡	0.019* (0.011)	0.027** (0.011)	-0.007 (0.008)	-0.007 (0.007)
父親年齡	-0.002 (0.009)	-0.009 (0.009)	0.004 (0.007)	0.006 (0.006)
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0.213*** (0.076)	-0.419*** (0.071)	-0.043 (0.056)	0.010 (0.051)
宜蘭縣	-0.543*** (0.082)	-0.861*** (0.074)	0.083 (0.061)	0.116** (0.055)
青少年健康狀況	-0.123*** (0.038)	-0.143*** (0.038)	0.467*** (0.029)	0.437*** (0.028)
常數項	-0.035 (0.391)	0.211 (0.381)	-1.504*** (0.295)	-1.516*** (0.273)
N	904	988	1588	1751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4-3 是第三階段的分析結果。第 (1) (2) (3) (4) 欄先加入交互作用項。第 (1) 欄可以發現家庭背景對基測分數依舊為顯著正相關，家庭背景提升 1 分會讓基測分數提升約 6.12 分，但親子關係對基測分數則無顯著影響。第 (3) 欄則可以看到親子關係對憂鬱呈正相關，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改善憂鬱情緒約 0.69 分；交互作用項並不顯著，顯示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間並沒有顯著的強化或削弱的效果。第 (2) (4) 欄則是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顯示家庭背景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業成績會提高 0.343 個標準差；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憂鬱情緒會提高 0.216 個標準差。

第 (5) (6) (7) (8) 欄加入其他控制變數後，第 (5) 欄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對基測分數的係數稍微下降，但依舊呈現正相關，係數約為 5.08；學校位在台北縣與宜蘭縣的學生，基測分數較台北市的學生低，但係數稍微下降，健康狀況對基測分數依舊是負相關。第 (7) 欄中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的係數也稍微下降，但依舊呈現正相關，係數約為 0.53；性別方面，女性較男性更為憂鬱；不同地區的國中生憂鬱情緒沒有顯著差異；健康狀況對憂鬱情緒呈現正相關。第 (6) (8) 欄則是標準化後的結果，第 (6) 欄顯示家庭背景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會提高學業成績 0.285 個標準差。第 (8) 欄則顯示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會提高憂鬱情緒 0.167 個標準差。

表 4-3 國三迴歸分析結果

	(1)	(2)	(3)	(4)	(5)	(6)	(7)	(8)
	基測分數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基測分數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家庭背景	6.122** (2.418)		-0.024 (0.296)		5.076** (2.421)		-0.030 (0.284)	
親子關係	-0.180 (1.796)		0.689*** (0.221)		0.754 (1.815)		0.532** (0.214)	
家庭背景(標準化)		0.343** (0.136)		-0.009 (0.107)		0.285** (0.136)		-0.011 (0.103)
親子關係(標準化)		-0.009 (0.087)		0.216*** (0.069)		0.037 (0.088)		0.167** (0.067)
家庭背景*親子關係	0.124 (0.211)	0.002 (0.004)	-0.003 (0.026)	-0.000 (0.003)	0.041 (0.210)	0.001 (0.004)	0.000 (0.025)	0.000 (0.003)
女生					0.622 (3.283)	0.012 (0.061)	-1.074*** (0.386)	-0.129*** (0.047)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5.519 (7.260)	-0.103 (0.136)	-1.308 (0.808)	-0.158 (0.097)
母親年齡					0.990* (0.575)	0.019* (0.011)	-0.072 (0.065)	-0.009 (0.008)
父親年齡					-0.059 (0.475)	-0.001 (0.009)	0.056 (0.057)	0.007 (0.007)
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10.722*** (4.055)	-0.200*** (0.076)	-0.211 (0.458)	-0.025 (0.055)
宜蘭縣					-28.864*** (4.362)	-0.540*** (0.082)	0.677 (0.500)	0.082 (0.060)
青少年健康狀況					-7.298*** (2.068)	-0.136*** (0.039)	3.595*** (0.241)	0.433*** (0.029)
常數項	109.530*** (20.396)	-0.216 (0.350)	63.531*** (2.492)	0.039 (0.278)	115.040*** (29.048)	-0.078 (0.527)	53.040*** (3.442)	-1.440*** (0.388)
N	968	968	1725	1725	903	903	1586	1586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5-1-1 為高三資料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在第 (1) (2) 欄可以看到，在青少年高三時，家庭背景對學測分數顯著正相關，家庭背景分數提高 1 分，會讓學測分數提升約 0.92 分，親子關係對學測分數影響則不顯著。第 (3) (4) 欄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無顯著相關，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則為顯著正相關，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改善憂鬱情緒約 0.54 分。

表 5-1-2 是將家庭背景、親子關係、學測分數、憂鬱情緒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與標準化之前的正負號及顯著性均相符。第 (1) 欄顯示家庭背景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測分數顯著提升 0.245 個標準差，與憂鬱情緒則無顯著關聯。第 (4) 欄可以發現，親子關係與學業成績無顯著關聯，但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憂鬱情緒提升 0.19 個標準差。



表 5-1-1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

	(1)	(2)	(3)	(4)
	學測分數	學測分數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家庭環境	0.923*** (0.130)		0.022 (0.061)	
親子關係		-0.022 (0.161)		0.541*** (0.066)
常數項	37.421*** (1.278)	45.957*** (1.872)	71.828*** (0.540)	65.833*** (0.751)
N	733	851	1520	1823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5-1-2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1)	(2)	(3)	(4)
	學業成績 (標準化)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家庭環境 (標準化)	0.245*** (0.034)		0.009 (0.025)	
親子關係 (標準化)		-0.005 (0.037)		0.190*** (0.023)
常數項	-0.047 (0.038)	0.001 (0.035)	0.015 (0.025)	-0.009 (0.023)
N	733	851	1520	1823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5-2-1 為高三第二階段加入控制變數後的分析結果。首先，在第（1）（2）欄可以看到，加入控制變數之後，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依舊呈現正相關，家庭背景提升 1 分，會讓學測分數提高約 0.92 分，親子關係則與學測分數無顯著相關；性別差異上，女性的學測分數會略低於男性；在家庭結構方面，不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相較於同住者學測分數較低；另外，青少年就讀學校位於台北縣者，學測分數較台北市的學生低。第（3）（4）欄可以發現，家庭背景與憂鬱情緒無顯著相關，親子關係則與憂鬱情緒正相關，提升親子關係 1 分，可以改善憂鬱情緒約 0.25 分；性別差異上，高三時的女性較男性更為憂鬱，且性別差異大於國三時；另外，宜蘭縣的學生較台北市的學生不憂鬱；高三青少年的健康狀況也與憂鬱情緒正相關，健康狀況越佳，則越不會有憂鬱情緒的產生。

表 5-2-2 是將家庭背景、親子關係、學測分數、憂鬱情緒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與標準化之前的正負號與顯著性均相符。第（1）欄可以發現，家庭背景增加一個標準差時，學業成績提升 0.243 個標準差。第（4）欄則可以看到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憂鬱情緒提升 0.089 個標準差，其幅度低於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性。

與國三時相比，家庭背景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依舊呈現正相關，但親子關係在高三時，則與學業成績無顯著相關，家庭背景對青少年憂鬱情緒依舊無顯著相關，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依舊是正相關，但係數皆有下降，原因或許是隨著青少年年紀漸長，父母在青少年學業上所能帶來的幫助也會降低，且隨著青少年心智逐漸成熟，親子關係的影響也會降低。另外，與國三時相比，高三時女性的學業成績表現會較男性差，學業成績上的性別差異，在國三時並不顯著，此外，女性不論在國三或高三時，都會比男性更為憂鬱，且到了高三時，性別差異會更加顯著；在家庭結構的差異上，高三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更會受到是否為單親家庭所影響，家庭結構的差異在國三時並不顯著；學校所在地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相關性則降低許多；青少年健康狀況與憂鬱情緒正相關。

表 5-2-1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

	(1) 學測分數	(2) 學測分數	(3) 憂鬱情緒	(4) 憂鬱情緒
家庭背景	0.916*** (0.137)		0.086 (0.058)	
親子關係		0.081 (0.175)		0.254*** (0.066)
女生	-1.679** (0.830)	-1.650** (0.828)	-1.293*** (0.335)	-1.444*** (0.330)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2.865** (1.318)	-3.121** (1.307)	-0.522 (0.506)	-0.704 (0.493)
母親年齡	0.185 (0.145)	0.310** (0.145)	0.011 (0.060)	0.024 (0.059)
父親年齡	0.212* (0.122)	0.085 (0.120)	-0.041 (0.051)	-0.026 (0.050)
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1.880* (1.016)	-3.227*** (0.973)	-0.472 (0.419)	-0.605 (0.394)
宜蘭縣	0.875 (1.064)	-1.119 (1.030)	0.857** (0.432)	0.849** (0.410)
青少年健康狀況	-0.371 (0.584)	-0.556 (0.591)	4.500*** (0.225)	4.278*** (0.227)
常數項	21.368*** (5.685)	31.024*** (5.692)	57.702*** (2.294)	55.121*** (2.249)
N	705	753	1429	1547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5-2-2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標準化）

	(1) 學業成績 (標準化)	(2) 學業成績 (標準化)	(3) 憂鬱情緒 (標準化)	(4)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家庭背景（標準化）	0.243*** (0.036)		0.035 (0.023)	
親子關係（標準化）		0.019 (0.040)		0.089*** (0.023)
女生	-0.149** (0.073)	-0.146** (0.073)	-0.175*** (0.045)	-0.195*** (0.045)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0.254** (0.117)	-0.276** (0.116)	-0.071 (0.068)	-0.095 (0.067)
母親年齡	0.016 (0.013)	0.027** (0.013)	0.002 (0.008)	0.003 (0.008)
父親年齡	0.019* (0.011)	0.008 (0.011)	-0.006 (0.007)	-0.004 (0.007)
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0.166* (0.090)	-0.286*** (0.086)	-0.064 (0.057)	-0.082 (0.053)
宜蘭縣	0.077 (0.094)	-0.099 (0.091)	0.116** (0.058)	0.115** (0.055)
青少年健康狀況	-0.033 (0.052)	-0.049 (0.052)	0.608*** (0.030)	0.578*** (0.031)
常數項	-1.472*** (0.490)	-1.220** (0.488)	-1.821*** (0.301)	-1.886*** (0.296)
N	705	753	1429	1547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表 5-3 是第三階段的分析結果。第 (1) (2) (3) (4) 欄先加入交互作用項，第 (1) 欄可以看到，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學測分數都無顯著相關。第 (3) 欄則可以看到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依舊為顯著正相關，親子關係提升 1 分會讓憂鬱情緒改善約 0.54 分，交互作用項並不顯著，顯示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間並沒有顯著的強化或削弱的效果。第 (2) (4) 欄為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顯示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憂鬱情緒提升 0.19 個標準差。

第 (5) (6) (7) (8) 欄加入其他控制變數後，第 (5) 欄中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依然對學測分數無顯著相關；女性的學測分數會略低於男性；在家庭結構方面，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相較同住者，學測分數會低約 2.88 分，學校位於台北縣的學生學測分數會略低於台北市的學生；第 (7) 欄中，家庭背景與憂鬱情緒無顯著相關，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依舊是正相關，但係數略為下降為 0.44；性別差異方面，女性較男性更為憂鬱；宜蘭縣的高中生，相較台北市的學生較不具憂鬱情緒；健康狀況與憂鬱情緒呈現正相關，提升健康狀況 1 分，會改善憂鬱情緒約 4.33 分。第 (6) (8) 欄則是標準化後的估計結果，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學業成績沒有顯著相關，親子關係增加一個標準差時，憂鬱情緒提升 0.156 個標準差。

與國三時相比，高三時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的提升，都與學業成績無顯著相關，相較而言，親子關係的提升，則一直以來都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改善有正面影響，但隨著青少年的成長，係數略微下降；性別差異方面，國三時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但高三時的女性學業成績會略低於男性；在家庭結構方面，國三時家庭結構對學業成績的影響並不顯著，但高三時單親家庭的青少年，其學業成績會顯著低於雙親家庭的青少年；學校所在地所帶來的影響在高三時不若國三時顯著；健康狀況的提升，則一直以來都對青少年的憂鬱情緒的改善有所幫助。

表 5-3 高三迴歸分析結果

	(1)	(2)	(3)	(4)	(5)	(6)	(7)	(8)
	學測分數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學測分數	學業成績 (標準化)	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 (標準化)
家庭背景	0.958 (0.631)		0.071 (0.279)		0.984 (0.637)		0.358 (0.253)	
親子關係	-0.179 (0.526)		0.540*** (0.207)		-0.087 (0.533)		0.444** (0.190)	
家庭背景 (標準化)		0.254 (0.167)		0.029 (0.113)		0.261 (0.169)		0.145 (0.103)
親子關係 (標準化)		-0.041 (0.121)		0.190*** (0.073)		-0.020 (0.123)		0.156** (0.067)
家庭背景*親子關係	-0.001 (0.054)	-0.000 (0.005)	-0.009 (0.024)	-0.001 (0.003)	-0.005 (0.054)	-0.000 (0.005)	-0.026 (0.022)	-0.004 (0.003)
女生					-1.619* (0.837)	-0.143* (0.074)	-1.352*** (0.335)	-0.183*** (0.045)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2.876** (1.324)	-0.254** (0.117)	-0.563 (0.505)	-0.076 (0.068)
母親年齡					0.190 (0.146)	0.017 (0.013)	0.009 (0.060)	0.001 (0.008)
父親年齡					0.208* (0.122)	0.018* (0.011)	-0.041 (0.051)	-0.005 (0.007)
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1.879* (1.018)	-0.166* (0.090)	-0.500 (0.417)	-0.068 (0.056)
宜蘭縣					0.874 (1.066)	0.077 (0.094)	0.830* (0.431)	0.112* (0.058)
青少年健康狀況					-0.279 (0.598)	-0.025 (0.053)	4.331*** (0.230)	0.585*** (0.031)
常數項	39.269*** (6.067)	-0.032 (0.448)	66.225*** (2.379)	0.124 (0.304)	21.831*** (8.226)	-1.466** (0.663)	53.673*** (3.054)	-1.391*** (0.411)
N	733	733	1520	1520	705	705	1429	1429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 第二節、國三到高三之變化

表 6 第 (1) (2) 欄呈現青少年國三到高三的變化。學業成績的變化，是將青少年國三及高三的基測分數及學測分數進行標準化後相減，憂鬱情緒的變化，則是將高三的憂鬱情緒得分減去國三憂鬱情緒得分後再進行標準化。迴歸分析顯示，國三到高三時學生的學業成績變化，與國三時的家庭背景正相關，國三時家庭背景的提升，與學業成績有正向關聯，親子關係的提升對學業成績的影響雖不顯著，但依舊呈現正相關。在憂鬱情緒的變化，國三時的家庭背景及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的改變，影響都不顯著；女性較男性憂鬱情緒較高；青少年國三時學校的所在地，對其後續的學業成績無顯著相關。

第 (3) (4) 欄則呈現了青少年在國三時的家庭背景、親子關係因素，會對其高三時的表現有何影響。第 (3) 欄可以看到，國三時的家庭背景與高三時的學業成績顯著正相關，國三時家庭背景增加 1 個標準差，會讓高三時的學業成績提升 0.17 個標準差，國三時的健康狀況，則與高三時的學業成績負相關；第 (4) 欄中也可以看到，國三時的親子關係與高三時的憂鬱情緒正相關，國三時親子關係增加 1 個標準差，會讓高三時憂鬱情緒提升 0.129 個標準差，女性較男性更為憂鬱，國三時學校的所在地，也會對青少年往後的憂鬱情緒有關聯，健康狀況則與憂鬱情緒的改善有正相關，顯示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親子關係、性別、學校所在地、健康狀況等因素，會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及憂鬱情緒有長期影響。

表 6 國三到高三學業成績、憂鬱情緒變化

	(1) 學業成績進步	(2) 憂鬱情緒改善	(3) 高三學業成績	(4) 高三憂鬱情緒
國三家庭背景（標準化）	0.045* (0.027)	0.030 (0.030)	0.170*** (0.048)	0.020 (0.029)
國三親子關係（標準化）	0.030 (0.027)	-0.047 (0.029)	0.020 (0.048)	0.129*** (0.028)
女生	-0.034 (0.049)	-0.149*** (0.057)	-0.066 (0.088)	-0.250*** (0.054)
國三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0.074 (0.110)	-0.021 (0.126)	0.083 (0.196)	-0.140 (0.121)
母親年齡	-0.009 (0.009)	0.007 (0.009)	0.004 (0.015)	0.006 (0.009)
父親年齡	0.012* (0.007)	-0.009 (0.008)	0.008 (0.012)	-0.004 (0.008)
國三時學校所在地 （對照組：台北市）				
台北縣	-0.024 (0.061)	-0.022 (0.069)	-0.176 (0.109)	-0.119* (0.066)
宜蘭縣	0.017 (0.066)	0.085 (0.071)	-0.438*** (0.117)	0.137** (0.068)
國三時青少年健康狀況	0.026 (0.032)	-0.193*** (0.036)	-0.031 (0.058)	0.272*** (0.034)
常數項	-0.872*** (0.308)	0.861** (0.360)	-0.295 (0.549)	-0.911*** (0.345)
N	401	1224	401	1236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 第三節、固定效果迴歸分析結果

表 7 及表 8 為固定效果迴歸分析的結果。固定效果模型中將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親子關係、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都進行標準化，並將第三波（國三）及第六波（高三）兩波資料合併，選擇在兩波資料中都有資料的樣本，進行迴歸分析，排除不隨時間變化的個人特性所產生的影響，以處理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問題。

表 7 為學業成績固定效果迴歸分析的結果，由於有填答學測分數的樣本較少，因此在學業成績固定效果迴歸分析的結果，樣本數與前面的分析相比較少。首先，在第（1）（2）欄先加入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第（3）（4）欄分別加入控制變數，最後在第（5）（6）欄再依序加入控制變數及交互作用。結果顯示，青少年在高三時，相較於國三時的學業成績顯著下降，這樣的結果或許是因為高三時的課業難度比國三時更加困難所致，另外，從圖 2 及圖 3 的標準化學業成績分布圖中可以看到，國三時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較平均分配於-2 到+2 之間，而高三時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則相對集中於-1 到+1 之間，兩段時期的學業成績分布狀況的不同，也可能造成兩段時期學業成績的差異。

其他變項不管是家庭背景、親子關係、或家庭結構、青少年的健康狀況，都與學業成績無顯著相關，其中，家庭背景固定效果對青少年學業成績影響不大，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學業成績的差異主要來自父母教育程度的影響，但在固定效果中父母教育程度會被排除，以致家庭背景固定效果並不顯著。

這樣的結果顯示，根據第一節的估計結果，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雖與學業成績正相關，卻非因果關係，故當使用個人固定效果模型排除不隨時間改變的不可觀測因素（time-invariant unobservables）之後，便不再看到顯著結果。其他因素如個人智力或學習精神可能才是真正決定學業成績的因素，但上述推論超出本資料所能驗證的範圍。



表 7 學業成績固定效果迴歸模型

	(1)	(2)	(3)	(4)	(5)	(6)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
家庭背景 (標準化)	-0.065 (0.050)		-0.068 (0.050)		-0.067 (0.050)	-0.070 (0.050)
親子關係 (標準化)		0.026 (0.024)		0.027 (0.024)	0.007 (0.030)	0.000 (0.032)
家庭背景*親子關係						0.017 (0.029)
高三	-0.627*** (0.025)	-0.628*** (0.021)	-0.624*** (0.026)	-0.630*** (0.021)	-0.624*** (0.026)	-0.624*** (0.026)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0.086 (0.093)	0.025 (0.079)	-0.085 (0.094)	-0.082 (0.094)
青少年健康狀況			-0.030 (0.030)	-0.011 (0.025)	-0.031 (0.030)	-0.030 (0.030)
常數項	0.643*** (0.023)	0.593*** (0.015)	0.755*** (0.107)	0.627*** (0.089)	0.755*** (0.107)	0.752*** (0.107)
N	901	1103	899	1101	899	899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圖 2 國三學業成績分布圖（標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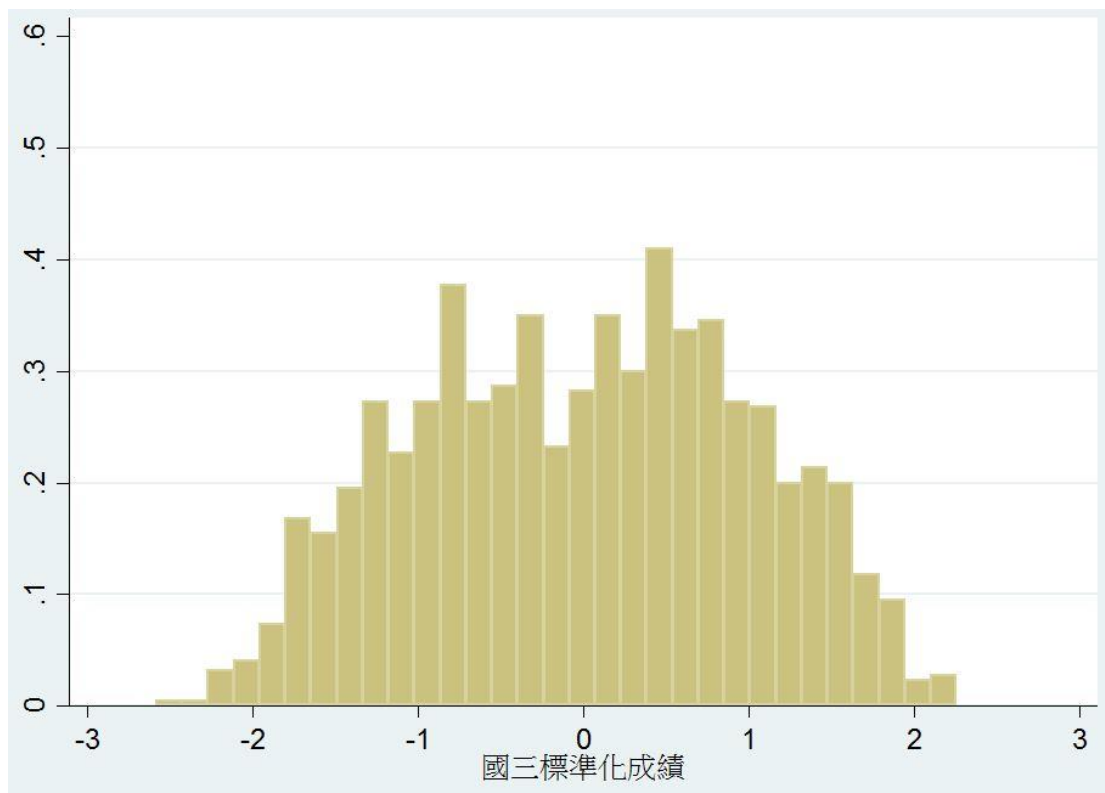


圖 3 高三學業成績分布圖（標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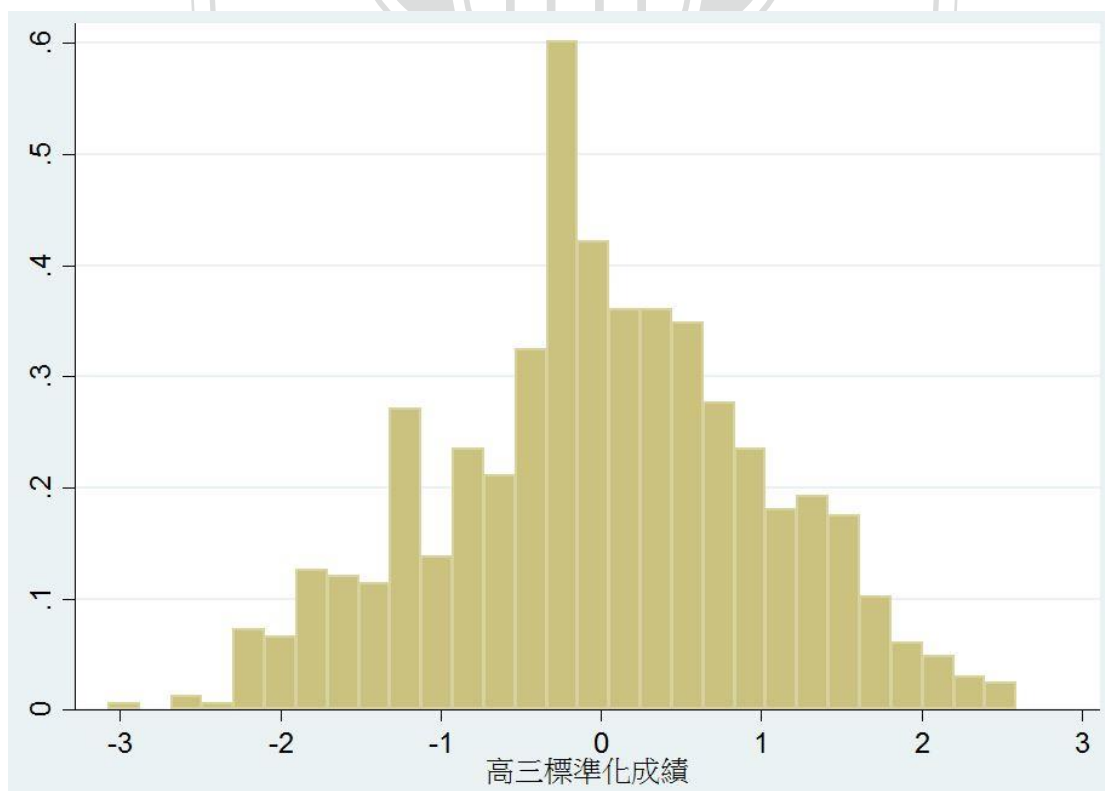


表 8 呈現憂鬱情緒固定效果迴歸分析的結果。在第 (1) (2) 欄先加入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第 (3) (4) 欄分別加入控制變數，最後在第 (5) (6) 欄再依序加入控制變數及交互作用。結果顯示，高三時的青少年，或許隨著年紀增長，心智也逐漸成熟，因而高三時的青少年在憂鬱情緒的表現上，相較於國三時，情緒較佳，高三時的青少年較不憂鬱。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呈現正相關但並不顯著，而親子關係的提升，也對青少年的憂鬱情緒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青少年的健康狀況，亦與憂鬱情緒的改善呈現正相關。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則無顯著交互作用。

表 8 憂鬱情緒固定效果迴歸模型

	(1) 憂鬱情緒	(2) 憂鬱情緒	(3) 憂鬱情緒	(4) 憂鬱情緒	(5) 憂鬱情緒	(6) 憂鬱情緒
家庭背景 (標準化)	0.010 (0.057)		0.025 (0.054)		0.024 (0.054)	0.024 (0.054)
親子關係 (標準化)		0.134*** (0.025)		0.108*** (0.024)	0.119*** (0.029)	0.119*** (0.029)
家庭背景*親子關係						0.000 (0.027)
高三	0.136*** (0.028)	0.120*** (0.024)	0.165*** (0.028)	0.155*** (0.024)	0.168*** (0.028)	0.168*** (0.028)
家庭結構 (對照組：與父母同住)						
單親及其他			0.124 (0.094)	0.135* (0.077)	0.113 (0.093)	0.113 (0.093)
青少年健康狀況			0.305*** (0.031)	0.301*** (0.027)	0.291*** (0.031)	0.291*** (0.031)
常數項	-0.019 (0.020)	-0.027 (0.017)	-1.131*** (0.115)	-1.134*** (0.098)	-1.091*** (0.115)	-1.091*** (0.115)
N	2799	3575	2793	3568	2793	2793

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10 \*\* p<0.05 \*\*\* p<0.01

## 第五章、結論

### 第一節、研究結論

首先，在家庭背景部分，本研究發現家庭背景會對學業成績有正向關聯，不論在國三或是高三時，青少年的家庭背景都與其學業成績正相關，高三與國三時相比，係數有稍微下降，但依舊是正相關，係數的下降或許是源自於隨著青少年的年紀漸長，學業難度隨之提升後，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影響有限，學業成績的提升要依靠青少年自身的努力，且隨著青少年逐漸成熟，原生家庭的影響力也可能逐漸減少。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的改善，在不同時期則有所不同，在國三時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的改善為負相關，但到了高三時，家庭背景對憂鬱情緒的改善則為正相關，但兩段時期的影響都不顯著。整體而言，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呈現顯著正相關，與本研究預期結果相符，也與過去文獻的發現相符，但在憂鬱情緒方面影響則不一。另外，根據固定效果模型分析結果，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呈負相關，但並不顯著，而家庭背景則與憂鬱情緒呈現正相關，但亦不顯著，這樣的結果或許是除了家庭背景之外，尚有其他因素會影響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

其次，在親子關係方面，本研究發現親子關係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只有在國三時呈現正相關，對高三的青少年則無顯著相關，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青少年在國三時心智尚未發展成熟，在生活上若有父母的幫助，會對國三青少年的學業表現有所幫助，但隨著年紀漸長，高三時的青少年與父母間的關係或許不若國三時緊密，父母在課業上所能提供的幫助也有限。但親子關係對憂鬱情緒的改善，則在不同時期都呈現顯著正相關，親子關係越為親密，則青少年越不會有憂鬱情緒的產生，顯示在青少年時期，父母適當的陪伴與提供意見都能對青少年帶來正面影響，讓青少年的成長的過程中不會因為遭遇困難而手足無措，而

能透過家庭的幫助，克服生活中遭遇的問題，讓青少年能夠健康且安心地成長，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預期結果相符，也符合過去相關研究的發現。另外，根據固定效果模型分析結果，親子關係與學業成績呈正相關但並不顯著，親子關係與憂鬱情緒則是顯著正相關，顯示親子關係的提升，能改善青少年的憂鬱情緒。

最後，本研究也觀察了其他變數對青少年學業成績及憂鬱情緒的相關性。在性別差異上，國三時的女性較男性更會有憂鬱情緒，但在學業成績的表現上差異不大，但到了高三時，女性不論在學業成績或憂鬱情緒的表現，都會顯著的比男性差。在家庭結構方面，相較於雙親家庭，國三時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其學業表現與憂鬱情緒都沒有顯著差異，但到了高三時，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其學業成績則會顯著地的比與雙親同住者差，顯示對青少年而言，在成長的過程中，若能有雙親的陪伴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會有所幫助。從學校所在地來看，則能發現城鄉差距的存在，相較於台北市的學生，台北縣跟宜蘭縣的學生學業成績都比較差，在國中時期，其成績甚至會相差 10 分及 29 分，但若看學校所在地與憂鬱情緒間的關聯，則會變成在宜蘭縣的學生最不憂鬱。在青少年健康方面，在國三時，青少年的健康狀況與學業成績呈現負相關，這點與過去文獻的發現較為不同，但健康狀況的提升不論在哪個時期，都對對憂鬱情緒的改善有正向關聯。

綜上所述，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對青少年學業成績與憂鬱情緒的影響，雖然程度不一，但整體而言都是正面的影響，且良好的家庭背景與親子關係，會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及憂鬱情緒帶來長期的影響，顯示良好的家庭背景與融洽的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的成長而言，同樣不可或缺，提升家庭背景條件固然重要，但親子關係地維持也不可輕忽，許多父母為了家庭努力的工作，而忽視了親子關係的經營，但父母只要在平時多花一點時間與子女相處，分享彼此的生活、討論家中的決定，在閒暇時也可以多安排一些休閒活動，培養彼此的感

情，不但可以緩和彼此的生活壓力，也能藉此促進家人間的互動，提升親子關係，讓子女覺得家庭是可以依靠的，在遇到問題時家人也能彼此商量、協助解決問題，都能有效減少自己與子女憂鬱情緒的產生，家人間的互相尊重，也能對青少年的人格養成有正面影響。

在單親家庭中時常會遇到諸如經濟、教養、生活壓力等挑戰，除了單親狀況所造成的家庭結構改變，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帶來衝擊，導致青少年出現憂鬱情緒，單親家庭的家長要獨自負擔經濟來源與子女教養的責任，也會讓單親家庭的家長要背負更大的壓力，本文研究結果也顯示，單親的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學業成績及憂鬱情緒皆為負相關，雖然在現今社會中單親家庭的比例越來越高，但單親家庭的家長要如何在維持經濟來源與子女的教養間維持平衡，則需要多加關注。

城鄉差距所與青少年學業成績間的負向關聯，也顯示了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對國三時的青少年而言，其就讀學校所在地與其學業成績高度相關，但隨著青少年年紀漸長，城鄉差距所帶來的劣勢也會隨之減少，另一方面，雖然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教育資源缺乏會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帶來負面影響，但城鄉差距所導致的教育資源缺乏，似乎也反映在就學壓力上，宜蘭縣的學生或許會因為學業成績表現較差而缺少競爭力，但也可能因為學習上的壓力較小，讓他們相較於台北市的青少年，他們或許能有更快樂的成長過程。

## 第二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研究限制。其一為本研究資料來源為「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其研究對象來自台北市、台北縣及宜蘭縣的國中生，而非全台灣隨機抽樣，故研究結果恐怕無法推論至北台灣以外的青少年，另外，由於資料庫樣本較少，以致在其中幾項迴歸分析中樣本數偏少，例如在學業成績的分析上，因為並非所有受試青少年皆有基測分數及學測分數，所以在其中幾項迴歸分析中樣本數較少。

其二為憂鬱情緒的分數是來自青少年自評，青少年在填答問卷時是否會為了符合期待而填答理想的答案，或者並沒有認真填答，皆不得而知，因而變項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其心理健康狀況，另外，因為資料庫的變項已經固定，所以也無法討論其他可能對青少年憂鬱情緒帶來影響的因素。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 丁學勤、曾智豐（2013）。影響國中階段貧窮學生學業表現之因素探析——以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扶助對象為例。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3(1)，1–42。
- 內政部（2019）。縣市結、離婚及結婚次數。台北：內政部。
- 王齡竟、陳毓文（2010）。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檢視同儕、專業與家外成人支持的緩衝作用。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1)，65–97。
- 主計處（2016）。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台北：行政院。
-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2020）。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台北：中研院。
- 朱崇信（2005）。青少年憂鬱情緒之相關因素研究：家庭經濟壓力與社會支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 江守峻、陳婉真（2018）。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之關係。教育學報，46(2)，21–41。
- 吳慧瑛（2007）。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五個出生世代的比較分析。人口學刊，34，109–143。
- 李佩嫻、黃毅志（2011）。原漢族群、家庭背景與高中職入學考試基測成績、教育分流：以臺東縣為例。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6(1)，193–226。
-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2000）。家務分工：就業現實還是平等理念？台灣社會學刊，24，59–88。
- 李敦仁、余民寧（2005）。社經地位、手足數目、家庭教育資源與教育成就結構關係模式之驗證：以TEPS資料庫資料為例。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2)，1–47。
- 沈暉智、林明仁（2019）。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7(3)，393–453。  
<https://doi.org/10.6277/TER.201909>
- 周新富（2008）。社會階級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以家庭資源為分析架構。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1–43。
- 林俊瑩、吳裕益（2007）。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階層線性模式的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3(4)，107–144。
- 林俊瑩、黃毅志（2008）。影響臺灣地區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構方程模式的探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45–88。
- 林耀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雙親教養態度、家庭功能與青少年憂鬱傾



- 向關係探討。臨床心理學刊，3(1)，35–45。
- 邱仕凱（2018）。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以學業發展自我效能為中介變數。教育學誌，40，59–120。
- 徐世杰（1993）。青少年憂鬱與社會畏懼、雙親教養態度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彰化縣。
- 張芳全（2006）。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影響之結構方程模式檢定。測驗學刊，53(2)，261–295。  
<https://doi.org/10.7108/PT.200612.0261>
- 張高賓（2004）。家庭心理環境、親子關係與兒童情緒經驗之關係探究。中華輔導學報，(16)，119–148。<https://doi.org/10.7082/CARGC.200409.0119>
- 張華甄（2012）。淺談父母離異對其子女的影響。家庭教育雙月刊，35，29–36。<https://doi.org/10.6422/JFEB.201201.0003>
- 教育部（2020）。108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概況。台北：教育部。
- 許崇憲（2002）。家庭背景因素與子女學業成就之關係：臺灣樣本的后設分析。中正教育研究，1(2)，25–62。  
<https://doi.org/10.6357/CCES.200210.0025>
- 陳杏容（2016）。家庭危險因子對少年之學業成就、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發展的影響累積危險指數模型的探討。台大社工學刊，34，41–84。  
<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6.34.02>
- 陳思帆、張高賓（2013）。國中生知覺家庭功能、社會支持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14，83–110。
- 陳婉琪、徐崇倫（2011）。愛的教育，鐵的紀律？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教育研究集刊，57(2)，121–154。
- 陳毓文（2004）。少年憂鬱情緒的危險與保護因子之相關性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4)，67–95。<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412>
- 曾竣璋、王鶴森（2012）。國中生健康體適能與學業成績之關係。大專體育學刊，14(3)，367–377。<https://doi.org/10.5297/ser.1403.010>
- 黃芳玫、吳齊殷（2010）。台灣國中生個人特質、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追蹤調查資料之研究。經濟論文叢刊，38(1)，65–97。
- 黃昱得（2014）。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多元風險因子：個別效果與累積效果的驗證。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7(3)，327–355。
- 黃碧端（2007）。暴增的大學與大學生。知識通訊評論，(59)，64–65。  
<https://doi.org/10.29957/RK.200709.0027>
- 楊孟麗（2005）。教育成就的價值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8(2)，75–99。<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506>
- 衛福部（2019）。108年自殺防治年報。台北：衛福部。
- 鄭麗珍（2001）。家庭結構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5)，197–270。<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01.05.05>

- 薛承泰（2000）。台灣地區單親戶之貧窮：以1998年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151–189。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00.02.04
- 謝孟穎（2003）。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成就關聯性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9(2)，255–287。
- 羅詩婷（2015）。家庭結構、同儕支持、家庭關係對青少年憂鬱情緒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南市。



英文文獻

- Baumrind, D. (1966). Effects of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37(4), 887–907.
- Bruffaerts, R., Mortier, P., Kiekens, G., Auerbach, R. P., Cuijpers, P., Demyttenaere, K., ...Kessler, R. C. (2018).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College Freshmen: Prevalence and Academic Functioning.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25, 97–103.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7.07.044>
- Buchmann, C., & Diprete, T. A. (2006). The Growing Female Advantage in College Completion: The Role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71(4), 515–541.
- Chevalier, A., Harmon, C., O' Sullivan, V., & Walker, I. (2013).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come and Education on The Schooling of Their Children. *IZ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8), 1–22. <https://doi.org/10.1186/2193-8997-2-8>
- Cobb-Clark, D. A., Ryan, C., & Sartbayeva, A. (2012). Taking Chances: The Effect that Growing Up on Welfare Has on the Risky Behavior of Young Peopl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729–75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442.2012.01704.x>
- Cobb-Clark, D. A., & Tekin, E. (2014). Fathers and Youths' Delinquent Behavior.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2(2), 327–358. <https://doi.org/10.1007/s11150-013-9194-9>
- Coleman, J. S., Campbell, E. Q., Hobson, C. J., McPartland, J., Mood, A. M., Weinfeld, F. D., & York, R. L.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s://doi.org/10.1016/0038-0121\(69\)90029-9](https://doi.org/10.1016/0038-0121(69)90029-9)
- Cyranowski, J. M., Frank, E., Young, E., & Shear, K. (2000). Adolescent Onset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Lifetime Rates of Major Depression A Theoretical Model.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7(1), 21–27.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7.1.21>
- Dangi, T., & Witt, P. (2016). Parenting Styles and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Youth Development Initiative*, 41, 245–246. <https://doi.org/10.13140/RG.2.2.18802.30400>
- Ding, W., Lehrer, S. F., Rosenquist, J. N., & Audrain-McGovern, J. (2009). The Impact of Poor Health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New Evidence Using Genetic Marker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8(3), 578–597. <https://doi.org/10.1016/j.jhealeco.2008.11.006>
- Eamon, M. K. (2002). Influences and Mediators of the Effect of Poverty on Young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1(3),

- 231–242. <https://doi.org/10.1023/A:1015089304006>
- Fletcher, J. M. (2011). The Medium Term Schooling and Health Effects of Low Birth Weight: Evidence from Sibling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0(3), 517–527. <https://doi.org/10.1016/j.econedurev.2010.12.012>
- Fröjd, S. A., Nissinen, E. S., Pelkonen, M. U. I., Marttunen, M. J., Koivisto, A. M., & Kaltiala-Heino, R. (2008). Depression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Middle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1(4), 485–498.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7.08.006>
- Girgus, J. S., & Yang, K. (2015). Gender and Depress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 53–60. <https://doi.org/10.1016/j.copsy.2015.01.019>
- Hale, D. R., Bevilacqua, L., & Viner, R. M. (2015). Adolescent Health and Adult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Pediatrics*, 136(1), 128–140.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4-2105>
- Haveman, R., & Wolfe, B. L. (1995). The Determinants of Children’s Attainments: A Review of Methods and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4), 1829–1878.
- Hysenbegasi, A., Hass, S. L., & Rowland, C. R. (2005). The Impact of Depression on the Academic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olicy and Economics*, 8(3), 145–151. <https://doi.org/10.7870/cjcmh-2015-025>
- Jackson, M. I. (2009). Understanding Links between Adolescent Health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emography*, 46(4), 671–694.
-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5), 747–776.
- Lin, M. J., & Liu, J. T. (2009). Do Lower Birth Weight Babies Have Lower Grades? Twin Fixed Effect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Evidence from Taiwa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8(10), 1780–1787.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9.02.031>
- Monna, B., & Gauthier, A. H. (2008).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arental Time.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9(4), 634–653. <https://doi.org/10.1007/s10834-008-9121-z>
- Nyarko, K. (2011).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2(3), 278–282. <https://doi.org/10.5251/ajsms.2011.2.3.278.282>
- Petersen, A. C., Compas, B. E., Brooks-Gunn, J., Stemmler, M., Ey, S., & Grant, K. E. (1993).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2), 155–16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1\)60871-4](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1)60871-4)
- Plug, E., & Vijverberg, W. (2003). Schooling, Family Background, and Adoption: Is It Nature or Is It Nur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3), 611–641.

- Prosser, J., & McArdle, P. (1996). The Changing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vidence for A Deterior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6(4), 715–725. <https://doi.org/10.1017/s0033291700037739>
- Robertson, J. F., & Simons, R. L. (1989). Family Factors, Self-Esteem,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1(1), 125–138.
- Salk, R. H., Petersen, J. L., Abramson, L. Y., & Hyde, J. S. (2016). The Contemporary Fa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Depression throughout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Chronicit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5, 28–35.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6.03.071>
- Trow, M. (1973).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18, 61–82.
- Tsou, M. W., Liu, J. T., & Hammitt, J. K.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Adoptions. *Economics Letters*, 115(1), 134–136. <https://doi.org/10.1016/j.econlet.2011.12.006>
- Weiser, D. A., & Riggio, H. R. (2010). Family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Does Self-Efficacy Mediate Outcome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3(3), 367–383. <https://doi.org/10.1007/s11218-010-9115-1>
- Yi, C. C., Wu, C. I., Chang, Y. H., & Chang, M.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aiwanese Youth: School versus Family Context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4(3), 397–429. <https://doi.org/10.1177/0268580909102914>
- Zax, J. S., & Rees, D. I. (2002). IQ, Academic Performance, Environment, and Earning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4(2), 600–616.